

北宋初年的北方文士與豪俠 ——以柳開的事功及作風形象爲中心*

伍伯常**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摘 要

本文藉著對柳開作風形象及戎績武略的描述，從而解說北宋初年文士與豪俠兩者混而為一、互相認同的風尚；透過柳開仕宦經歷的說明，顯示宋廷用人政策的根本矛盾；擴闊「重文輕武」論點的理解空間，闡釋「重文」並不必然導致「輕武」。北宋在締造文治格局的過程中，不斷遇上武臣抵制以至地方治安不靖等問題，這些皆非一般文官可以解決，武質文臣則優為之。因此，任用疆幹武質文臣，遠比儒雅卻流於柔弱的文臣管用；武質文臣管治地方時所發揮的移風易俗等效用，亦絕非只知戎務而昧於文治的武將所能望其項背。換言之，重文與輕武非但沒有必然對立的關係，相反，宋廷要建立文治局面，便須藉著武質文臣的武幹能力，鎮服武人和維持地方治安。

然而，武質文臣每多在言行失卻平衡，而出現標奇立異等行為；忽於繩檢，觸動了宋廷大忌，遂淪為打擊對象，柳開正是這一類武質文臣的典型。柳開的際遇，反映宋廷雖然看重武質文臣對於建立文治局面的貢獻，但當這類臣僚涉及狂妄言行而抵觸改良風俗的措施時，統治者即不惜予以嚴厲果斷打擊。宋廷制裁武質文臣所作諸種有違規範言行的做法，體現了對於武質文臣效績以及維護移風易俗政策兩者之間所作的取捨平衡，而不應簡單地理解成純粹輕武政策所致。

關鍵詞：文士，文吏，豪俠，武質文人，崇文抑武

* 本文承蒙兩位審查人在研究文獻徵引詮釋、文士豪俠產生背景、柳開事功及其榮辱界定標準、宋軍抵禦遼師所採用的戰術和戰略、文士與豪俠結合困難以及這個困局與宋廷用人矛盾的關係等方面，均提出很多具有啟發性和前瞻性的意見，使筆者闡釋宋初崇文抑武這個歷史現象時，得到修正補充，從而令論點更為具體堅實。本文修改時，嘗引錄部分審查報告文字，筆者不敢掠美，故在正文或注腳道出，藉此向有關學者的指正表達敬意，並致以謝忱。

** 本文作者電子郵件信箱：cipaksng@cityu.edu.hk。

一、引言

本文所稱的北宋（960-1127）初年，指柳開（947-1000）在趙宋建國後由成長、應舉以至踏上仕宦生涯那一段時期的生命歷程，即由宋太祖（960-976 在位）建隆元年（960）至宋真宗（998-1022 在位）咸平三年（1000），共四十年。所涉及人物的地域範圍方面，本文將討論焦點放在華北地區成長以及活躍於當地政治、文化圈中的士人；^{（註 1）}採用這種做法的目的，在於避免因體例需要而顧及其他地區人物時所造成的枝節描寫，以方便建立論點，並非表示南北地區的士人不相往來，雙方沒有產生任何互動關係。

在這四十年期間，北宋統治者為了政治需要，頗致力於改變自唐末、五代以來盛行的重武輕文舊習，而齊之以文辭學術和典章禮儀。可是，在改變時代風氣的過程中，早期不免出現武風熾盛而文風仍不足以相敵的現象，柳開正是這個轉變時代的重要人物，故探討價值很高。一直以來，柳開在宋代的歷史地位，源自他作為古文運動的先驅；治績武略，相對而言受到忽視，到近年才開始受學者注意。^{（註 2）}

本文不擬交代柳開一生之中的所有經歷，只欲說明他的行事作風與時代風尚的關係以及兩者如何影響著他的仕途發展；所擬解說的歷史問題，是北宋初年文士與豪俠兩者混而為一、甚至互相認同的風尚；以柳開作為論證重點的原因，在於他身兼文士與豪俠兩種不同特點，卻又能夠融為一體，使兩種人物的作風特色

1. 日本學者嘗以北方文臣作為研究重點，如西川正夫根據正史所載在華北出生文臣的資料，再按地域分類，描述這批文臣自五代於關內、河東、河北和河南等地的活動概況。見氏著，〈華北五代王朝的文臣官僚〉，《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創立二十周年紀念論集 III〕27 期（1962），頁 211-261。
2. 濱田直也談及柳開在邊郡的事功和行事作風，並嘗試將柳開在五代至宋初戰亂之世中的士大夫和英雄氣質復現出來。惟濱田直也以柳開所撰的〈默書〉為研究重點，與拙文相涉的部分不多。見氏著，〈『默書』——北宋の士大夫柳開について——〉，《東方宗教》63 期（1984），頁 36-54。曾瑞龍以北宋戰略文化的形成和演變作為研究重點，但他也注意到北宋初年柳開等武質文人行事作風的特點，以及這些特點如何衝擊著一直被宋史學界所廣泛採納的「重文輕武」觀點。見氏著，《經略幽燕（979-987）：宋遼戰爭軍事災難的戰略分析》（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頁 7-10。陳峰對柳開亦有論述，要點如下：「太宗一朝，不僅僅武將漸漸感到無用武之地，受到朝野的輕視，即就是喜好談兵，或性情尚武的文臣，也終於發現自己與朝廷乃至於自己承擔的角色存在了距離，從而失去了大展宏圖的機會。如柳開就是有這樣遭遇的一位代表人物。」見氏著，《武士的悲哀——北宋崇文抑武現象透析》（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頁 95。陳氏所論與拙文的看法有很大分別，詳見後文。

同時在他的生平事蹟之中具體展示出來。本文將從以下各項闡釋論點：透過《宋史·文苑傳》的記載，概括介紹被列入的宋初文士所表現的作風形象；從柳開的文教功過與治績武略兩方面，刻劃當日武質文人的行事特色，從而道出柳開的作風形象為甚麼可以理解為時代風尚的標記。

誠然，這個範圍有待處理的問題尚多，例如科舉發展如何影響文士與豪俠的數目和進用機會，以及他們與南宋事功學派的關係，都是饒有研究價值意義的課題。(註³)至於柳開古文的創作實踐、由此引伸出來的文學道統理論以及上述兩點對北宋古文運動發展所產生的影響，已有不少學者作出細密的研究分析，本文不擬再作討論。(註⁴)內容所涉及的柳開事功和角色形象說明，皆對本文論點的建立有所裨益。

3. 審查意見書嘗就宋代「文人與豪俠」的進用情況作以下說明：「中葉以後，官員人數增加，北人中舉出仕卻相對減少，自然減少了官僚中的『文人與豪俠』；何況，官僚制度愈是成熟，官員人數愈是超過官缺數目，任官就愈講究資序，相對減少了『文人與豪俠』擔任要職的機會，但這並不表示沒有這些人，只是未曾出頭，待有時代需要，破格用人，他們又再浮現，南宋末年就是如此。宋初用人，是否較為自由，以致『文人與豪俠』較易受到提拔，作者似可追究。」這些筆者都非常同意，有一點可以補充：破格用人之舉，在南宋之前已經出現。曾瑞龍以北宋中葉的西北邊區為例，道出拓邊活動與科舉落敗的關中豪俠受到重視的關係，見氏著，〈北宋中葉拓邊活動的開端——慶曆朝水洛城事件發微〉，收入楊炎廷編，《宋史論文集：羅球慶老師榮休紀念專輯》（香港：香港中國史研究會，1994），頁20-45。當然，要具體認識這個問題，還需多做些個案研究。審查報告也提到南宋事功派興起的原因：「宋初需要『文士與豪俠』，不待多言，澶淵之盟後，粉飾太平，〔對文士與豪俠〕需要減少，但自從西夏戰爭一發不可收拾後，需要又增加，直至南宋亡國。事功派的興起，正在此時。」《宋史》記載事功學派重要人物葉適（1150-1223）和陳亮（1143-1194）的事蹟時，交代他們的軍事素養和能力：葉適在開禧北伐失敗後，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有劫奪俘馘、建堡固防之功；陳亮亦「喜談兵」，並「嘗攷古人用兵成敗之跡，著《酌古論》」。見脫脫（1313-1355）等撰，《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卷434〈葉適傳〉，頁12983-12984；卷436〈陳亮傳〉，頁12929。然而，要具體說明南宋事功學派與北宋初年文士與豪俠的關係，對於拙文的篇幅和重點而言，目前恐怕未能做到。尚有一點要強調的，是筆者不敢否定這種推測可能性，但必須指出在得到足夠史料佐證之前，不便遽下斷言，故不擬在拙文處理這個依然有待證明的歷史問題，俟來日另文探討。無可否認，這是一個很富啟發意義的看法，非常值得重視。
4. 柳開的古文創作和道統理論，祝尚書有很深入的說明，見氏著，《北宋古文運動發展史》（成都：巴蜀書社，1995），頁11-46。其他有關宋代古文運動的論著，可參考金中樞，〈宋代古文運動之發展研究〉，收入宋史研究會編《宋史研究集》（臺北：中華叢書委員會，1978），頁144-215；陳植鏗，〈略論宋初古代運動的兩種傾向〉，收入鄧廣銘、鄺家駒等主編《宋史研究論文集：一九八二年年會編刊》（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頁431-451。Peter K. Bol亦在第五章“Civil Policy and Literary Culture: The Beginnings of Sung Intellectual Culture”談論宋代古文運動發展與政局關係，見氏著，《This Culture of Ours: Intellectual Transitions in T'ang and Sung China》（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pp. 148-175。

二、宋初文士的形象作風與「首用文吏而奪武臣之權」的政策

有關《宋史·文苑傳》的寫作要旨，編修《宋史》的史臣作以下闡述：

自古創業垂統之君，即其一時之好尚，而一代之規橐，可以豫知矣。藝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奪武臣之權，宋之尚文，端本乎此。太宗（976-997在位）、真宗其在藩邸，已有好學之名，及其即位，彌文日增。自時厥後，子孫相承，上之為人君者，無不典學；下之為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錄，無不擢科，海內文士，彬彬輩出焉。國初，楊億（974-1020）、劉筠（971-1031）猶襲唐人聲律之體，柳開、穆修（979-1032）志欲變古而力弗逮。廬陵歐陽修（1007-1072）出，以古文革，臨川王安石（1021-1086）、眉山蘇軾（1037-1101）、南豐曾鞏（1019-1083）起而和之，宋文日趨於古矣。南渡文氣不及東都，豈不足以觀世變歟！作〈文苑傳〉。（註5）

柳開名列〈文苑傳〉的原因，正如史文所陳，在於力圖在文體上改變唐人聲律之體而另闢蹊徑，在古文寫作的領域中與穆修並稱於世。由於本文的論述範圍是太祖、太宗兩代及真宗即位早年，所以觀察重點只限於這一段時期有助於說明柳開行事作風的史事。根據《宋史·文苑傳》記載，除了柳開外，其餘生於北方地區而主要活動年代在太祖至太宗統治時期的士人，還有宋白（993-1009）、梁周翰（929-1009）、趙隣幾（921-979）、和峴（933-988）、和嶢（951-995）、馮吉（919-963）、高頔（905-986）、李度、韓溥、鞠常（928-974）、宋準（938-989）、安德裕（940-1002）共十二人。（註6）

這些文人雖然同傳，但相異之處頗多，明顯有別的地方，是作風形象的分野。自古以來，文人可以概括分為端士與狂生／豪俠兩大類。（註7）觀《宋史·文苑傳》

5. 《宋史》卷439〈文苑傳序〉，頁12997-12998。

6. 主要活動時段在真宗統治期間的士人不包括在內，理由是柳開在真宗之世只活了三年，而且北宋政治文化的塑造，肇始於太祖，成於太宗，至真宗朝，尚文之風早已鑄就，這個時代的變革意義遂不彰顯，此乃本節集中討論宋初兩朝入於〈文苑傳〉文人的原因。

7. 在拙文的內容上言，狂生和豪俠皆為具有文士身份而不願遵循既定價值規範的人物；兩者的主要分別，是狂生主要在言談詞章方面表達其悖異於時的本色，豪俠則專指喜好自眩駭眾和戎事邊功的任俠之徒。

所載上述諸人的行事作風，入於端士類的有趙隣幾、高頤、李度、韓溥、鞠常、宋準和安德裕，他們除了優於文詞之外，部分人物的操守也有過人之處，受到帝王稱賞。^(註8)其他六人〔包括柳開〕每多任情率性，有些甚至屬於行止不端之輩；入於狂生／豪俠之列者，彼此關係也不盡和睦。^(註9)自北宋中葉開始，端士所佔的比例超過狂生／豪俠，這說明文教高度發展，對於文人行事作風發揮了規範作用。狂生／豪俠在比例上言雖不逮於端士，但仍穩佔一定勢力；他們的持續出現，堪稱與北宋文壇的發展相終始，入於《宋史·文苑傳》的石延年（994-1041）和賀鑄（1052-1125）即屬其例。^(註10)則文人之中的狂生／豪俠存在之廣泛，亦可以想像得到。

狂生／豪俠的出現以及持續存在，體現了北宋相對寬容的文化政策：朝廷獎勵文教，造就為數甚多的知識份子，也成就他們屬於自己階層的獨特自豪感，部分更以不尋常的方式作自我表達；文人採用非常規的自我表達方式時，只要不過於挑戰統治權威或抵觸國家政策，一般而言都會得到當政者寬容。因此，自北宋中葉以來，文化學術的發展已臻於燦爛之境，文教規範也產生了潛移默化的作用，但有關狂生／豪俠事蹟的記載，依然史不絕書。

上引〈文苑傳·序〉不僅有助於理解宋代文風的發展演變，更可藉此認識宋初文人的身份特質以及他們與地方行政架構重建的關係。這篇序文強調太祖扮演了創業垂統之君的角色，以個人好尚改變了時代風習，進而成就一代規模的偉業；具體做法是「首用文吏而奪武臣之權」，這個措施，開創宋代尚文風氣的先河。一

8. 端士藉操守而見稱於帝王，可參考這個事例：「雍熙二年（985），太宗親試貢士，〔高〕頤子南金舉學究，自陳曰：『臣父年八十四，嘗佐使幕，久已罷職，家貧無以存養。願賜一第，庶獲寸祿，以及老父。』上問左右其父何人，宰相宋琪以頤對，且言其素行廉介，老而彌厲，甚為摺紳推重。上曰：『此高頤子耶！頤在大名幕中，嘗與朕游處，迨逾旬月。晨暮對案飲食，常拱手危坐，未曾少懈，其恭謹蓋天性也。惜其老矣，不欲煩以官政。』即擢南金第，拜頤左補闕致仕，賜錢十萬。」見《宋史》卷440〈高頤傳〉，頁13020。
9. 柳開與和峴嘗因公事而鬧得很不愉快。柳開在〈宋州龍興寺浴室院新修消災菩薩殿壁記〉的小字夾注說：「時任宋州錄事參軍，有轉運使和峴，誣奏予盜庫金，被制降使劾之，以拘于寺中。」見《柳開集》卷9〈宋州龍興寺浴室院新修消災菩薩殿壁記〉，載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成都：巴蜀書社，1988），卷123，頁678。本文採用《全宋文》本的原因，在於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為這個版本做過參校輯補工作，詳見《全宋文》卷115所錄的版本說明，頁562。
10. 有關兩人狂生／豪俠作風的描述，見《宋史》卷442〈石延年傳〉，頁13070-13071；〈賀鑄傳〉，頁13103-13104。作風類同狂生／豪俠的文人，當然不可能盡皆收入《宋史·文苑傳》，其他類傳實際上也有收錄。張載（1020-1077）入於《宋史·道學傳》，但他早年的作風行徑與好戎事而喜邊功的豪俠並無二致：「少喜談兵，至欲結客取洮西之地。」見卷427〈張載傳〉，頁12723。

直以來，史家對於北宋初年開國政策這個課題，每多採用重文輕武之類的觀點作為研究主線。^(註 11)然而，太祖開國時，契丹已經興起，中國境內割據政權林立，太宗繼位後，雖然解決了北漢問題，但未幾即與契丹連場大戰，西北邊區亦頻受党項侵擾。在這種嚴峻的形勢之下，宋朝亟需強大武力保衛國土，根本欠缺推行輕武政策的國際環境。^(註 12)因此，「首用文吏而奪武臣之權」政策的真正意義，實有細加考察的必要。

本文首先要處理的，是「文吏」的定義。根據史籍記載，受太祖重用的文吏，並非如一般人所理解的「束名教之檢，則必曰導之以禮」之輩，果真如此，則必定導致「盜用侮而益暴」，對維持地方治安完全沒有正面意義。^(註 13)在太祖的心目中，理想的文吏不但要有強力行政手腕和果斷處事作風，而且多帶有武幹性質。

11. 發揮北宋重文輕武觀點的著作，可參考蔣復璁，〈宋代一個國策的檢討〉，收入《宋史研究集》第一輯（臺北：國立編譯館，1980），頁 407-449；趙鐵寒，〈關於宋代「強幹弱枝」國策的管見〉，收入同書，頁 450-453。近年來，國內學者陳峰在北宋文武關係這個領域用力甚勤，發表亦多，現按年份分述陳氏研究的主要論點如下：一、《武士的悲哀——北宋崇文抑武現象透析》。陳氏在書中引用大量史料，證明宋廷對武將甚為猜防；惟陳氏列舉的證據不無爭議，太宗朝的楊業是一個例子。曾瑞龍已在《經略幽燕——宋遼戰爭軍事災難的戰略分析》書中指出陳峰：「以較通俗的形式討論了某些武將遭受迫害壓抑的例子，如楊業。然而這些例子未必全部反映文武衝突，可能只是元從或藩邸舊部排斥其他系統的武將所致。」（頁 25，註 27）類似問題亦在陳氏描述太祖朝武臣的際遇中出現。陳氏以「崇文抑武」政策，是張瓊（？-963）之死的導因，但根據史料記載，張瓊自殺，是武臣中人事鬥爭所致，性質與楊業事件相似，並沒有明顯證據道出文官參與其事或太祖意欲透過置張瓊於死地而提高文官的地位。二、〈從樞密院長貳出身變化看北宋「以文馭武」方針的影響〉，收入漆俠主編，《宋史研究論文集——國際宋史研討會暨中國宋史研究會第九屆年會編刊》（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2），頁 48-61。該文指出宋太祖雖然竭力恢復文臣的政治角色，以矯前代武人跋扈之失，但其尚未忽視武將的重要性。太宗一朝，「在刻意推行抑制武將政策的形勢之下，樞密院雖在形式上保留了昔日舊制，但在實質上卻弱化了武職長貳的角色作用，將大量具有軍職身份卻無武將本色的親信之徒安插其中，為自己掌管軍權。」樞密院內的武臣，無論在人數以至權力地位皆處於下滑，是北宋「以文馭武」政策發揮效果的表現。三、《宋史論稿》（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4）該書收錄了作者多篇論文，涉及拙作的研究範圍有〈從「文不換武」現象看北宋社會的崇文抑武風氣〉（頁 112-129）。這篇論文談到柳開，但重點在於柳開嘗以文資換武職，到邊州尋求發展，卻難施抱負，「不僅如此，柳氏因為有了從武經歷，最終還在士大夫筆下留下了嗜殺，甚至喜食人肝的傳聞。」（頁 117）陳氏對柳開的看法，與其在《武士的悲哀》的論點相似。（頁 95-98）這大概由於這篇文章建立在舊有著作的基礎上，加以整理而成。柳開在筆記小說出現這類傳聞，是否「因為有了從武經歷」所致，筆者甚表懷疑，正如張齊賢（943-1014）同樣有戎事經歷，但他在筆者小說中的形象比柳開正面得多。由於篇幅所限，筆者不擬在這裏多所涉及。四、《北宋武將群體與相關問題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4）這本書基本上是陳氏根據早前的著作，稍作結構改動和文字修改而成，相信是陳氏對以往所提出論點的一種自我肯定。陳氏的研究重點和結論，與拙文不同之處甚多，詳見下文。
12. 羅文注意到時代需要與武將掌握軍事權力的關係，並指出後來局勢穩定，武將乃被投閒置散。因此，北宋「重文輕武」及「以文馭武」等基本國策是逐步演變而成，並非一朝一夕的事。見氏著，〈北宋文臣統兵的真相〉，收入漆俠主編前見書，頁 27-47。何冠環對北宋武將的征戰生涯、權力鬥爭和人脈關係嘗作細緻而深入的分析，詳見氏著，《北宋武將研究》（香港：中華書局，2003）。
13. 李昉（925-996），《李昉集》卷 2〈濟州刺史任公屏盜碑〉，載《全宋文》卷 46，頁 23。

這些要求，與時代風氣存在密切關係：北宋初年，已有士大夫質疑儒學能否對應時代問題，而提出兼習諸家學說的需要；^(註 14)當日文武的劃分界線並不明顯，很多文人在行為作風上具有急功好義的豪俠性質，且喜以豪傑自居，通文墨之餘，還懂武藝或識兵勢，甚至兩者兼具，名列〈文苑傳〉的柳開，正是這一類人物。

柳開生於大名。^(註 15)對於宋人來說，大名是魏州治下的屬縣，同時又是魏州及其管轄範圍的別稱。^(註 16)魏州是河北重鎮，而河北民風豪邁好武，行事不拘小節，加上位處邊陲，飽歷外族憑陵和藩鎮割據，更激化當地民眾惟戎是尚的風習，任俠之風於焉大興。^(註 17)河北不僅雜有慷慨悲歌之士，亦聚集僥倖兇險之徒，魏州更是這一類人物的淵藪，品流異常複雜。^(註 18)柳開成長於任俠之區，不免沾染這些習尚。

張景（970-1018）對柳開狀貌及其好尚意氣的性格作這樣描述：「公為布衣，神貌奇偉，尚氣自信，不顧小謹。凡所結交，皆求豪傑有出于人者，視齷齪俗儒

14. 如王禹偁（954-1001）在〈用刑論〉中表達他對儒學不足以對應世用的關注：「予自幼服儒教，味經術，嘗不喜法家流，少恩而深刻。洎擢第入官，決斷民訟。又會詔下為吏者，皆明法令，考績之日，用是為殿最，乃留意焉。後以制誥、舍人領廷尉，朝夕閱視，亦少詳矣。」見《王禹偁集》卷 15 〈用刑論〉，載《全宋文》卷 151，頁 436。
15. 柳開祖上因五代戰亂，嘗徙居於魏州、館陶一帶。有關柳家在魏地徙居的史料，見於《柳開集》卷 9 〈東郊野夫傳〉，載《全宋文》卷 123，頁 686-687；同書，卷 10 〈宋故穆夫人墓誌銘并序〉及〈宋故昭義軍節度推官試大理評事柳君墓誌銘〉，載《全宋文》卷 124，頁 700、705。祝尚書對柳開先世的遷徙情況作了詳細考證，見氏著，《柳開年譜》，收入吳洪澤、尹洪主編，《宋人年譜叢刊》（成都：四川大學出版，2003），頁 205-206。
16. 《宋史》卷 86 〈河北路〉，頁 2121-2122。魏州有屬縣十二：元城、莘、大名、內黃、成安、魏、館陶、臨清、夏津、清平、冠氏和宗城。有關以魏州為治所的魏博由中唐至五代的發展情況，可參考毛漢光，〈魏博二百年史論〉，收入氏著，《中國中古政治史論》（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頁 323-390。
17. 河南與河北俱在北方，以武風熾盛而言，河北猶勝於河南，原因是河北乃承受外族兵鋒的前緣區域，居民慣於爭戰所致。宋人曾對河北、河南兩地武風作深入討論。雍熙四年（987）四月：「先是，上以契丹頻歲入寇，將大發兵討之，遣使往河南北諸州，募丁壯為義軍……宰相李昉等相率上奏曰：『近者分遣使傳出外料兵，自河東河南四十餘郡，凡八丁取一，以充戎行。蓋國家以備獯戎，事非獲已，臣等頗聞輿議，皆言河南百姓不同被邊之民，世習農桑，罔知戰鬪，遽茲括集，皆匪願為，或慮人情動搖，因而逃避，相聚為盜，更須剪除。如此，則河北閭閻既困於戎馬，河南生聚復擾於萑蒲，矧當土膏之興，更妨農作之務。』」開封府尹陳王元僖亦上疏談到：「況又河南久為內地，人戶非能便習武藝，不可盡募戎行。河北累經戎馬，頗有嫻習馳射，或可選置軍中。望且於河朔緣邊諸州點集，止令本處守捍城池，河南諸州停罷。」太宗終於採納其言。見《長編》卷 28，頁 633-634。柳開來自魏州，而當地亦久為兵衝之區：「初，唐末構亂，朱、李扼河相持，魏為干戈之地。」見〈行狀〉，頁 313。故柳開的軍事素養，實源於獨特的地理和文化背景。
18. 無賴之徒聚集魏州一帶，見於以下例證：「〔李飛雄〕凶險無行，不為其家所容，常客遊京師、魏、博間，與無賴惡少縱酒捕博。」見李燾（1115-1184），《續資治通鑑長編》（中華書局標點本，下文簡稱《長編》），卷 19，頁 429。

輩不與語。」^(註 19)《宋史》亦稱柳開「性倜儻重義」。^(註 20)其不自貴重、好交接豪傑以及交友時所顯示的尚義之風，在散施事情上表露無遺。柳開嘗自云：「鄴中大族，我家也。」^(註 21)《青箱雜記》亦云：「柳崇儀開家雄於財，好交結，樂散施。」^(註 22)柳開一直視賑濟貧弱為豪傑應有的美德，這種想法終其一生沒有改變，他在去世前所成的〈默書〉仍不忘說：「拯弊多功，拯危多德。」^(註 23)柳開俠義之風，亦表現於救助弱女的事情上。潘永因在《宋稗類鈔》中抄錄《談撰》所載柳開助人制僕之事，而置於「豪曠」類：

柳仲塗開，赴舉時宿驛中。夜聞婦人私哭，聲婉而哀。曉起詢之，乃臨淮令之女。令在任深貪墨，委一僕主獻納。及代還，為僕所持，逼其女為室。令度勢難免，因許之，女故哭。柳往見令，詰之，得其實。怒曰：「願假此僕一日，為子除害。」僕至柳室，則令市酒果鹽梅等物。俟夜闌，呼僕人叱問曰：「脅主人女為婦，是汝耶？」即奮匕首殺而烹之。翌日，召令及同舍飲。云：「共食僕肉。」飲散亟行。令追謝，問僕安在？柳曰：「適共食者乃其肉也。」^(註 24)

祝尚書以其事「蓋小說家言，未必是實」。^(註 25)然宋人普遍視柳開為「豪曠」的俠客，應該是無可置疑的。柳開在〈默書〉表達了南、北風尚有別的理解：「南文尚訟，北武尚殺。」^(註 26)路見不平，拔刀相向而非訴諸詞訟，乃河北民眾普遍認同

19. 張景〈故如京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知滄州軍州事兵馬鈐轄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河東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柳公行狀〉，載《全宋文》卷 271，頁 314。下文簡稱〈行狀〉。

20. 《宋史》卷 440〈柳開傳〉，頁 13028。

21. 《柳開集》卷 10〈宋故昭義軍節度推官試大理評事柳君墓誌銘〉，載《全宋文》卷 124，頁 705。

22. 吳處厚，《青箱雜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 6，頁 63。既有雄厚的財力基礎，柳開尤致力於濟乏四方遊士：「公一日與所友者坐酒肆酣飲，其側有一士人，亦與人酌，氣貌稍異，語言時若可聽。公問之士人，通姓名，即至自京師，以貧不能葬父母暨家之數喪，聞府主王公祐名士也，將求之以襄其事。公召以與同席，審之得實，意甚可愍，謂之曰：『生之費將用幾也？』曰：『得二十萬錢為可。』公潛計，復謂曰：『且就舍，吾為生謀之。』公雖大族，然以重義好施，頗耗其家。以是人故，竭其資蓄，得白金百餘兩，錢數萬遺之。議者以郭元振之義，不能遠逼。以是四方之士遊魏者，畢歸之，故聲名喧赫于遠邇。」見〈行狀〉，頁 314。這一則故事亦為其他筆記小說收錄，見王闢之，《澠水燕談錄》（北京：中華書局，1981），卷 3，頁 32。這類事例，反映柳開的好義俠名，已是名聞遐邇。

23. 《柳開集》卷 7〈默書〉，載《全宋文》卷 121，頁 660。另見濱田直也，前揭文，頁 49-50。

24. 潘永因，《宋稗類鈔》（北京：書目文獻出版，1985），頁 296。

25. 《柳開年譜》，頁 221。

26. 《柳開集》卷 7〈默書〉，載《全宋文》卷 121，頁 660。濱田直也解釋〈默書〉的文句意思及這篇文字所根據的文獻時，沒有觸及正文所引錄的兩句話，見氏著，前揭文。

的價值；柳開輕俠殺人，不外是這種集體價值的具體反映而已。(註 27)作為俠客，自然要精通兵略技擊。柳開嘗自云：「少知兵略，識吳起、孫武之機鈐。」(註 28)柳開嫻熟武藝，不僅「善射」，也懂擊劍，〈行狀〉載柳開之父柳承翰在顯德末年為南樂令：「公年十三，夜與家人眾立于庭廡間，有盜入其室，皆驚畏不能動。公呼走取劍，盜踰垣而出，公從而揮之，斷其足之二指。聞者歎其膽氣之異焉。」(註 29)柳開有此材具，實秉承河朔的勇武風習。

以武犯禁，是俠客的典型行徑，柳開亦優為之；對抗對象不僅是官府禁令，遇上不順其意者，雖族中長輩亦不惜冒犯。正如「樂散施」為柳開建立聲望，但同時耗損家財，不禁引起家人疑慮，柳開嘗為此事向父兄申辯：「彼人耳，吾人耳，又何間哉？且天地之中孰有內外也？四海之人皆我之親也。已苟有所分別，雖父母兄弟，果肯不以他心待之乎？已苟無間于人，即孰忍間于吾乎？」根據〈東郊野夫傳〉記載，父兄亦以柳開所見為是。(註 30)柳開的辯解能否令其父兄信服，已難詳考，但肯定的是其父兄未能改變柳開濟乏的做法，而族中長輩欲限制柳開散施之舉時，更惹來強烈反擊：

而季父主家事，多靳不與。時趙昌言（935-1009）方在布衣，旅游河朔，因以謁開，開屢請以錢乞趙，季父不與，開乃夜篝火燒舍，季父大駭，即出錢三百緡乞趙。由此恣其所施，不復吝也。(註 31)

27. 張洎（934-997）知相州時所得的經驗，可以作為河北流行輕俠殺人風氣的佐證。《長編》載太平興國六年（981）十二月：「相州民有張姓者殺一家六人，詣縣自陳，縣以上州。知州張洎詰之，曰：『某家之姻貧困，常取息，少有所負，被其詬辱。我熟見而心不平，思為姻家報仇，幸畢其志，然所恨七口而遺其一，使有噍類。私讐已報，願就公法。』洎曰：『殺人一家，寧無黨乎？』對曰：『某既出身就死，肯復連及同謀。』又曰：『汝何不亡命？』對曰：『姻家即某隣，苟不獲盜，豈得安堵？』又曰：『汝不即死，何就縲紲？』曰：『我若滅口，誰當辨吾姻不與謀？又孰與暴其事於天下？等死，死義，可乎！』洎曰：『吾將言聞上，免汝之死。』曰：『殺人一家而苟活，且先王以殺止殺，若殺人不誅，是殺人終無已。豈願以一身亂天下法哉，速死為幸。』洎嗟數四，卒案誅之。河朔間多傳其事云。」見卷 22，頁 509。

28. 《柳開集》卷 1〈知鄆州上陳情表〉，載《全宋文》卷 115，頁 566。

29. 〈行狀〉，頁 313；《宋史》卷 440〈柳開傳〉，頁 13028。

30. 《柳開集》卷 9〈東郊野夫傳〉，載《全宋文》卷 123，頁 686-687。

31. 《青箱雜記》，卷六，頁 63-64。

柳開性格兇頑，舉動不合禮節，從引文所述可謂表露無遺。^(註 32)若以文士重操守、慎言行的品格標準繩之，柳開的行徑迹近於無賴流氓，他能夠名列〈文苑傳〉，體現了宋初的文士本色，相較於後世對文人所作的普遍理解，可謂南轅北轍。

與柳開同列〈文苑傳〉的宋白也是大名人：「嘗館於張瓊（？-963）家，瓊武人，賞白有才，遇之甚厚。」^(註 33)張瓊是宋初名將：「少有勇力，善射」，而「性暴無機，多所凌轢」，充份表現出只重戰鬥、無視儀節的悍將本色。^(註 34)宋白一介書生，與這類悍將交往，居然懂得拿捏分寸而取得對方好感，原因在於他並非文弱書生，而是性格「豪俊，尚氣節，重交友」，且「多遊鄆、杜間」。^(註 35)觀宋白的性格作風，很明顯帶有游俠色彩，而非只懂誦讀的文人；俠客與武將交情深厚，自然算不上令人驚訝的事。另一個入於〈文苑傳〉的梁周翰出身於武將家庭，更進一步顯示宋初文人具有深厚的軍事淵源。

有趣的是，在宋初以事功見稱的武質文臣如王明（919-991）和臧丙（940-992），皆生於大名，其中臧丙「家財鉅萬，悉以散朋友親戚，視之糞土如也」，他亦嘗「落魄于杯酒間」，且「嬉遊任俠者十五餘年」。^(註 36)臧丙行徑，與其同鄉柳開相似，同樣是喜任俠而忽繩檢。柳開等人地域背景相同而作風相似的現象，似乎不能以巧合目之；若從區域文化對歷史人物的行事作風所發揮的塑造功能觀之，相信更能得其實況。^(註 37)〈文苑傳〉所載有關武質文人作風形象的普遍意義，亦可從當日文臣的價值觀念和身份認同之中表現出來。《長編》載乾德四年（966）十一月：

-
32. 柳開行事如此無賴，可能與家人管教不力有關。〈宋故中大夫行監察御史贈祕書少監柳公墓誌銘并序〉載北宋滅後蜀，太祖召柳開之父柳承翰上殿，語之曰：「聞爾治家嚴而平，如朕治天下也。居官處，食井水外，一無所取。吏犯必責不貸，公事不枉而速。儼立危坐，人過促走，若睹神明。鄉黨親賓畏爾不為不善。不厚妻子，不疏弟姪，不私蘊，不妄前。朕知爾久也。淮、泗居東南，水陸叢委，吳臣未來，越民未歸，郡刺史多惡政。朕方制削諸夏，州立通判，爾去為朕先，區境將用爾同理也。」見《柳開集》卷 10 〈宋故中大夫行監察御史贈祕書少監柳公墓誌銘并序〉，載《全宋文》卷 124，頁 696-697。若證諸以上有關柳開行為的史料，墓誌銘頗有虛美成分，並非信實之言。
33. 《宋史》卷 439 〈宋白傳〉，頁 12998。西川正夫透過五代武將禮遇文臣以及模仿文人風習的分析，指出武將文臣化的現象已經在武風極強的時代出現。詳見氏著，〈華北五代王朝的文臣と武臣〉，收入仁井田陞博士追悼論文集編集委員會編《仁井田陞博士追悼論文集》第一卷（東京：勁草書房，1967），頁 289-314。
34. 《宋史》卷 259 〈張瓊傳〉，頁 9009-9010。
35. 《宋史》卷 439 〈宋白傳〉，頁 12998。
36. 《王禹偁集》卷 20 〈諫議大夫臧公墓誌銘并序〉，載《全宋文》卷 156，頁 552。
37. 程民生對宋代地方文化及其所呈現的特色作廣泛研究，有助於瞭解不同地區的民風和文化差異。詳見氏著，《宋代地域文化》（河南：河南大學出版社，1997 年）。

上嘗納涼後苑，召儀莫制，儀至苑門，見上岸憤跣足而坐，因卻立不肯進。閤門使以奏，上自視微笑，遽索冠帶而後召入。未及宣詔意，儀亟言曰：「陛下創業垂統，宜以禮示天下，臣雖不才，不足以動聖顧，第恐豪傑聞而解體也。」上斂容謝之。（註38）

竇儀（912-964）祖籍薊州漁陽，是盧龍節度使的巡屬。盧龍舊稱燕，傳統以來盛產豪傑遊俠，古稱燕趙豪俠，盧龍即佔其一。《舊唐書》對盧龍地區的民風作以下形容：「碣石之野，氣勁人豪。二百餘載，自相尊高。」（註39）用字簡約，但鮮明地揭示當地雄豪剛勁的民風；自相尊高的習尚，亦道出了盧龍居民的個人主義和榮譽感極強，遇見不平或與個人榮辱有關的事，往往不惜揮刃相向，以熱血相灑。燕地豪俠喜愛以武犯禁的作風，實其來有自。竇儀之父竇禹鈞及其兄竇禹錫「皆以詞學名」，竇儀亦「十五歲能屬文，晉天福中舉進士」。背景出身，反映竇儀力圖在文詞領域謀求發展，然宦途卻由於地域文化和時代影響而充滿著軍事色彩：

侍衛軍帥景延廣（892-947）領薊州節度，表為記室。延廣後歷滑、陝、孟、鄆四鎮，儀並為從事。開運中，楊光遠（?-944）以青州叛，時契丹南侵，博州刺史周儒以城降，光遠與儒遣人引契丹輕騎於馬家渡渡河。時延廣掌衛兵，顏衍（889-962）知州事，即遣儀入奏。儀謂執政曰：「昨與衍論事勢，有所預慮，所以乘晝夜不息而來。國家若不以良將重兵控博州渡，必恐儒引契丹踰東岸與光遠兵合，則河南危矣。」俄而儒果導契丹渡河，增置壘柵。少帝軍河上，即遣李守貞（?-949）等率兵萬人，水陸並進，守汶陽，據要害。契丹果大至，擊走之。（註40）

竇儀長期任職景延廣幕府，耳濡目染，熟知戰鬥攻伐，懂得兵機，洞悉契丹的進兵路向，乃向朝廷提供計策，終能切於機要而立下功勳。而與竇儀共參軍事的顏衍，也是文官出身：「自言兗國公四十五世孫。少苦學，治《左氏春秋》。梁龍德中擢第，解褐授北海主簿，以治行聞」，其後迭任武將符習和房知溫（?-936）的

38.《長編》卷7，頁182。竇儀使太祖服冠帶事並非發生在乾德四年十一月，確實年月已不能詳考，李燾遂趁敘述竇儀去世之便而追補這一段往事。

39. 劉昫（887-946）等撰，《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180〈贊〉，頁4683。

40.《宋史》卷263〈竇儀傳〉，頁9092。

幕職。^(註 41)他能夠在軍事上有所建樹，相信亦由於浸淫軍務日久，逐漸掌握其要。因此，竇儀向太祖所陳，對於瞭解宋初文官的形象角色，很有說明價值：宋初文人每多兼習武事，富軍事素養的文人亦往往自覺置身在豪傑之列，正如竇儀本身是文官，卻以太祖無禮於己會引致豪傑解體，則在他的心目中，早已將卓有文韜武略的臣僚一併稱為豪傑，自己也是當中一份子。竇儀的例子並非偶然出現，北宋初年，性質相近的事例尚多。《長編》載開寶三年（970）九月，宋軍征伐南漢，殺其將伍彥柔：

梟其首以示城中，城中人猶堅守弗下。隨軍轉運使王明言於潘美（925-991）曰：「當急擊之，恐援兵再至，則為所乘，我師老矣。」諸將頗猶豫，明乃躬擐毋胄，率所部護送輜重卒百餘人，丁夫數千，畚鍤皆作，堙其塹，直抵城門。城中人大懼，遂開門以納王師。^(註 42)

王明並非是役主帥，但很懂掌握戰場形勢變化，俟機而作，瓦解敵人的抵抗意志。《宋史》載其出身宦歷：「大名成安人。晉天福中，舉進士不第。騎將藥元福（884-960）為原州刺史，辟為從事。馮暉（894-953）節制靈武，表為觀察判官。周廣順初，元福領陳州防禦使，奏署判官。會劉崇（895-954）寇晉州，命元福將兵援之，事多咨於明。」^(註 43)王明文人出身，久歷戎行而諳熟行軍用兵之道，這種軍事素養的累積過程，與竇儀的經歷在性質上沒有分別。

尤須注意的，是兼習兵事也發生在久享盛名的儒臣身上。張昭（894-972）諳熟典故，在五代、宋初一直有博學多識之譽。《宋史》稱他在顯德元年（954），「遷兵部尚書」，「嘗詔撰《制旨兵法》十卷」。^(註 44)他在〈進所撰兵法表〉自陳：「臣本書生，不嫻武藝。空忝稷卨之位，慚無卻縠之能」，乃將家中所藏之書「摭其兵要，自軍旅制置，選練教習，安營結陣，命將出師，詭譎機權，形勢利害，賞罰告誓，攻守巧拙，星氣風角，陰陽課式等都四十二門，離為十卷。」^(註 45)這是《制旨兵法》的寫作緣起。《宋史》又稱其：「博通學藝，書無不覽，兼善天文、風角、

41. 《宋史》卷 270〈顏衍傳〉，頁 9253-9254。

42. 《長編》卷 11，頁 250。

43. 《宋史》卷 270〈王明傳〉，頁 9265。

44. 《宋史》卷 263〈張昭傳〉，頁 9091。

45. 《張昭集》卷 1〈進所撰兵法表〉，載《全宋文》卷 8，頁 201-202。

太一、卜相、兵法、釋老之說，藏書數萬卷。」^(註 46)以上史文，反映當時文臣所習，並不侷限於經史子集。^(註 47)

隨著時光流逝，文武兼尚漸漸偏離宋初軌跡，變成惟藝文是尚，參與軍事文臣，在文韜武略方面皆不足以應付職任所需；^(註 48)這個失衡現象，成為北宋中葉以來目光遠大的文人所關注的課題。〈文苑傳〉以柳開、穆修並稱，著眼點在於兩人皆「欲變古而力弗不逮」；穆修頗有孤芳自賞，甚至狂傲放宕之態，行事作風與柳開有點相似。^(註 49)與本文課題關係尤深的，是兩人皆強調文人擁有軍事素養的重要性。穆修在〈上大名陳觀察書〉曰：

修嘗病近世以來，文武異道，將相異材，為弊于時久矣。古之所謂文武之道，蓋一道也，但治亂之用殊；所謂將相之材，皆通材也，由出處之寄異。未有不達權謀而名能相國者，未有不名學術而名能將兵者。則古之取將相也，率由文武之道一焉。近世則不然，謂儒為文，謂卒為武。苟登之為相矣，則不復寄以軍武之任，而曰此文人也，不足語以武；苟拔之為將矣，則不求以儒術之學，而曰此武夫也，不當責以文。時既擇將相之具不同，人遂目文武之術為異。時之所以不得其人，人所以不盡其用，其弊皆出于此乎。^(註 50)

穆修的主要活動時期在真宗登位後至仁宗（1022-1063 在位）早年，即天聖十年（1032），對於時代問題觀察而作的說明，自然有別於柳開。從兩人看法的不同之處，可以發現太祖、太宗之世與真宗至仁宗早年兩個時代，文人與軍事的關係已

46. 《宋史》卷 263 〈列傳 22·張昭傳〉，頁 9091。

47. 入於《宋史·儒林傳》的士人，亦有兼習軍事的風氣，例如胡旦：「少有雋才，博學能文辭。舉進士第一」，之後一直維持「喜讀書」的習慣：「既喪明，猶令人誦經史，隱几聽之不少輟。」他也頗涉獵軍事議題，在太宗朝嘗上〈平燕議〉，並「著《漢春秋》、《五代史略》、《將帥要略》、《演聖通論》、《唐乘》、《家傳》三百餘卷。」見《宋史》卷 432 〈胡旦傳〉，頁 12827-12830。

48. 關於真宗以後允文允武官員數目大減的原因，審查報告有以下看法：「真宗以後，科舉成為最主要的入仕途徑，內容又趨向文學，所學以文事為主，故懂軍事文人確有減少，此可以部分解釋『文士與豪俠』氣象較宋初低落的原因。此外，北人中舉的比例下降，也減少了『文人與豪俠』的出仕。研究者必須留意宋代不同時期的科舉內容和改變〔如王安石的科舉變法〕，才能說明士風的變化和人才的升降。宋初的情況，作者應有交代。」筆者很同意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研究題目，但拙文重點在於宋初武質文人的作風形象，在文中論及科舉制度內容，恐怕造成枝節太多而變得臃腫。筆者目前可以做的，是在註釋引述這個意見，以揭示對這個問題深化研究的路向，俟來日撰文細論。

49. 有關穆修的形象作風，見《宋史》卷 442 〈穆修傳〉，頁 13069-13070。

50. 《穆修集》卷 1 〈上大名陳觀察書〉，載《全宋文》卷 322，頁 414。

經有很大改變：文武同途是柳開所處時代的特色，是繼承自唐末五代而來；穆修所見，則是文武已經分途，而且由此衍生出種種流弊。至於穆修的觀察是否有所偏差，不是本文的論述範圍，然他與柳開同樣提倡文人應該重視軍事素養，則是顯而易見的，這是北宋初年不少文人所具有武質特點的反映，也是我們研讀《宋史·文苑傳》時所應當注意的要點。

三、柳開的事功及其時代意義

本節所談的柳開事功，指他任內於郡縣管治和邊區戎務的表現。柳開在這兩方面所顯示的能力，很對應北宋對士人的要求，即具有文韜武略，在氣魄意志和辦事能力方面足以取代武人，中央政府遂可藉著這一類文臣整頓地方行政架構，並且將文官的管治範圍擴大到邊區。柳開在開寶六年（973）中第後，首任工作是宋州司寇參軍，掌管當地刑獄事宜。〈行狀〉解釋這個職官的建置緣起曰：「太祖方注意刑政，去州郡馬步使立號，新立司寇參軍。」^{（註 51）}可見它的建置目的，很富針對五代時期武人專擅地方刑法陋習的意味。

太宗繼位後，亦非常重視司寇參軍的職任功能，田錫在〈送張司寇序〉有具體描述：「聖主嗣位，黎元是憂。始命諫臣，權莅觀風政；次以賢帥，遙領擁旄之任。唯擒姦摘伏之寄，理獄常刑之司，司寇主之，久虛其位。苟非素諳練于政術，善精究于刑章，則安能應執政之虛懷，伸循吏之歷試也！」至於膺選的張姓士人所抱的才具，田錫也有所說明：「嗜經史之學，眾人推之曰巨儒；懷經緯之文，識者目之曰奇士。嘗副天階之選，光有士材之名，宜乎彰華纓，列清貫，出則應皇華之命，居則朝丹墀之下。」張生既有出眾才具，卻在縣級行政機關任職卑官，這個現象，關係著當日政府向釋褐士人授職的做法：「必試諸難，君子不器，何所弗適？」田錫對這種做法的背後理念有更一步的發揮：

余常觀俊茂之士，居廉秀之中，未嘗不以兼濟天下為心。逮乎獲太常之名，居初命之秩，吏事迫屑，壯圖消磨，何暇恤人之憂，而拯人之急。今皇帝閱生民之利病，精進仕之才能，故命天官，課以判第，取其善者，

51. 〈行狀〉，頁 314。

然後用之。君始以文翰升甲科，又以書判為高第……幸識量之通變，器官職之高卑，汲之以仁，勿忘兼濟之心也。（註52）

田錫對司寇參軍的職責有具體描述，亦詳細交代膺選官員在文翰書判俱臻於優等之列；嚴格挑選，反映太宗十分看重「生民之利病」問題，期待司寇參軍在這方面作出貢獻。這篇文章，說明了太宗為了使司寇參軍的作用得到更大發揮，乃著意尊崇這個職任，強化它的管治角色，使擔任此職的文臣感受榮耀而不妄自菲薄，以便朝廷驅使他們盡忠職守。大抵柳開在任時期受到朝廷的褒揚宣傳所感染，工作態度認真，而且表現不俗，故在開寶九年（976）「以治獄稱職，就遷錄事參軍」。（註53）此後，柳開一直在宋州工作，直至太平興國四年（979），仕途再有新發展。太宗在這一年親討北漢，柳開被擢為贊善大夫隨駕北征；柳開在宋州任職錄事軍時的表現，是他得到升遷的原因。（註54）

柳開從駕北征後，即被擢為知州，事緣宋軍攻打北漢時，柳開「督楚、泗八州菽粟，皆先期集事」，幹辦之才遂得到充分表現，為太宗所嘉許。（註55）至於選派常州，柳開在〈上皇帝陳情書〉有所說明：「是時朝辭南邁，聖旨面宣，謂常、潤之民苦寇賊之患，令臣剿絕，用洽承平。臣到本州，尋除君惡。」（註56）觀柳開早年事蹟，與盜賊交手不但其來有自，也是在族中揚名的事由；再觀其一生功業，治盜是備受注目的一項，〈行狀〉對其掃蕩賊寇的武幹能力作以下記述：

公至〔常州〕，使諭盜曰：「吾來，汝速歸，歸則生，又厚賞汝；不歸，將盡死矣。」遂設奇，多捕獲，咸戮之。賊懼，稍稍有歸者，公撫慰之，給府庫衣物，私出緡益之，自解衣加其酋首，皆致于左右。或說公曰：「寇不可近，且虞或變之禍也。」公曰：「彼失所則為盜，得其所則吾民矣。始懼死，而我親愛之，出其望也。我亦赤心感之，未歸者盡思歸我。」

52. 《田錫集》卷15〈送張司寇序〉，載《全宋文》卷90，頁141-142。田錫在文中提及「聖主嗣位，黎元是憂」，可見這篇文章成於太宗即位以後。

53. 〈行狀〉，頁314。柳開治獄的表現，尚見於以下事例：「時曹民多訟，屢構大獄。至道元年（995），以公知曹州，不數月，辭鬪咸息。」見〈行狀〉，頁317。

54. 柳開在太平興國二年（977）至三年期間任職宋州錄事參軍時，為京東轉運使和峴劾奏其盜庫金，被拘於龍興寺，「此案審理結因如何不詳，蓋以不得其實而罷，故柳開後來仍得遷升。」見《柳開年譜》，頁224。

55. 〈行狀〉，頁314。

56. 《柳開集》卷1〈上皇帝陳情書〉，載《全宋文》卷115，頁563。

矣。」果如其言，不半歲，閩境肅寧。遷殿中丞。明年，移知潤州，拜監察御史。潤人熟公治常之跡也，畏公如神明。(註 57)

北宋初年，匪患是地方安寧的一大威脅，由於中央政府致力解除地方武備，官員的屏盜能力，對於地方治亂的決定意義便更為特出。柳開採用的手段，與當日的能吏基本一致，仍不外乎斬伐威嚇；待盜匪知懼歸降，才以恩信邀結其心。恩威並濟，令柳開威名大著，來自其他州郡的盜賊亦懾於其威勢，不敢在其轄境生事。文臣憑個人武幹擔當清剿盜匪之任，可說是北宋鮮明的時代特色。

柳開知潤州，直至太平興國九年（984）才被太宗「詔歸，出貝州，加殿中侍御史。」出知貝州，性質與任職常、潤知州大有分別：知常、潤兩州雖然負責轄境治安，但對手畢竟只是賊匪，貝州乃被邊之地，知州所要應付的，正是驍悍善戰的契丹勁騎。以武質文臣為邊州守臣，是北宋力圖將文官管轄範圍擴大以減輕對武將倚賴的具體施為；柳開由內郡調任到邊州，反映了他的武幹受到太宗注目。可惜貝州之任歷時不長：「明年，坐與兵馬都監執公事爭鬥，貶上蔡令，時雍熙二年也。」(註 58)

儘管帝王大力鼓吹地方官員職掌的重要性，士大夫也懂得湊趣逢迎，但士大夫心中的真正想法，往往是另一回事。柳開在〈與張員外書〉著力美化臨民之官的角色，且強調它的重要性；(註 59)而聲言重視地方基層官員的功能之餘，又以這類職任為潦倒：「開負罪南遷，逐為縣令，囚繫下位，愁憂日煎。骨肉之間，疾病太半，俸薄家貧，食不充飽。」(註 60)「逐為縣令」，即指貶任上蔡令。柳開在〈上參政呂給事書〉更吐露他對於中央官與地方官始終有高下分別的看法：「夫國家以科第爵位取士者，要欲安民治國，扶樹教化。自千百人中，始得一人登禮部。

57. 〈行狀〉，頁 314-315。

58. 〈行狀〉，頁 315。柳開在雍熙三年（986）嘗向呂蒙正（944-1011）解釋事件性質曰：「無毫髮贓賄，上不負國，下不侵民，止以王事與同事爭競，審言于上。」見《柳開集》卷 5〈上參政呂給事書〉，載《全宋文》卷 119，頁 621。

59. 柳開在〈與張員外書〉曰：「自古國以民為本。臨民者，官也。官設其品，任其大小者也。今之君、宰相之下，府尹、州牧、縣令皆臨民者也，大抵不及縣令之親于民也。府尹、州牧持其紀綱而已，非所以知民之善惡者也。府總其州，州總其縣，縣之政，總于其令。令能養其民，則一邑之內，公與私無所違；令不能養其民，則一邑之內，公與私俱亂，不得其安，雖無兵革饑饉之災，民稼不完，民業不經矣。」收入《柳開集》卷 2，載《全宋文》卷 116，頁 584。

60. 《柳開集》卷 5〈上史館相公書〉，載《全宋文》卷 119，頁 622。

自禮部由吏部為州縣吏，復于千百人中，始得一人登朝籍，立之于朝廷，居之以顯位，出入受寄，承天子宰相指畫，理平小大。」^(註 61)以朝官為貴、州縣為次等職任之意，可謂躍然紙上。^(註 62)

柳開雖有這些想法，但證諸〈行狀〉記載，他貶為上蔡令時，工作情緒並無因此而陷於低落或對朝廷生怨懟之念，所以史料載其戮力供職，很有作為：

公在常州多所殺戮，蔡人畏公之名也。公即蔡，悉召父老與言，政有害民者，以利除之；民有辭訟，非故鬥至傷者，必盡其理而赦之。民皆曰：「公非不能震畏，實愛我之深也。」督租賦不以利勸，諭其約而已，民懷公仁，莫敢逋負。^(註 63)

以上表現，顯示柳開在當時對仕宦前景滿有信心，沒有因暫時失意而志氣消沈。柳開在地方上的政績，除了解決刑獄、盜賊和民生等問題之外，還見於處理少數民族侵擾。柳開不獨在北邊有良好表現，在素無背景淵源的南疆亦見其過人之處。

北宋邊患，主要來自北邊和西北，但居於南境的少數民族，有時對中央政府的管治威信也構成衝擊。太祖收荊湖後，任用獠人秦再雄管轄鼎、澧、辰、沅、邵陽之地的蠻族，冀收以夷制夷之效。^(註 64)處於更南面的全州，宋廷每有鞭長莫及之困，當地到了太宗統治晚期，甚苦於蠻寇之暴，政府在當地部署軍隊，亦不能有效抵禦：「先是，全西溪洞有粟氏者，聚族五百餘口，率常殺掠民，虜民婦女。以至戶無積糴，野無耕牛，皆為粟氏攘奪，雖隻雞斗粟，悉致民乏。今朝廷遣使臣，置峽口、香烟、羊狀等七寨禦之，不能制其為患。」因此，柳開初知全州時，當地居民仍「方苦蠻寇」。太宗以柳開出知全州，很有知人善任的況味；証諸柳開的表現，亦反映他心存不辜任使之念，盼以佳績令太宗留下深刻印象：

公至，乃出府庫帛製衣，造銀帶暨巾帽數百副，選衙吏之勇力可使者，

61. 《柳開集》卷5〈上參政呂給事書〉，載《全宋文》卷119，頁619。

62. 柳開所言並非獨特的看法，有不少士大夫持有相同見解。王禹偁嘗稱美地方職任，但他在〈送牛冕序〉明言：「今天下之士由科第入仕者，以第進士為美名；隸京官者，以游三館、兩制為近職；釐外務者，以任刺史二千石為親民。」見《王禹偁集》卷12，載《全宋文》卷148，頁391。時人以登第入仕為美，不容置疑，而近職與外務，畢竟有次序差等之別。

63. 〈行狀〉，頁314-315。

64. 見拙作〈北宋選任陪臣的原則：論猜防政策下的南唐陪臣〉，載《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新第10期（2001），頁12-13。

得三人，俾入溪洞，諭粟氏曰：「天子擇我來此，爾輩倚山恃嶮而害我民。爾出，當與爾賞，與爾屋，為爾居，與爾田，為爾業。不然，將益兵深入，盡滅爾類矣。」粟氏懼，留衙吏二人為質，其一與粟氏酋長俱出，公賜以衣帽、銀帶、緡錢，親犒勞撫慰，謂吏民曰：「粟氏自此不為爾患，可犒之。」吏民爭以鼓樂飲粟氏。居數日，公命粟氏乘馬還洞，口約日并族而出。至日，酋長先率數十人來歸。不月，携老幼盡數百口俱至，公賞犒如一，遂營室而使聚居焉。（註65）

《長編》敘述此事時，頗採〈行狀〉所載，顯示張景這部分的描述十分翔實，可足徵信。（註66）柳開降服群蠻後，為其民眾營築居所和置辦田產，酋長則入覲京師，「太宗命五酋首皆為全之上佐官。至今被命服，有俸給，而完其族也。」觀柳開到任後，短時期內即將問題徹底解決，令太宗亦「以為能，賜錢三十萬。」（註67）武質文臣有利於地方管治之處，於此又見一斑。柳開畢竟讀儒書出身，很瞭解朝廷為治原則，在於「安民治國，扶樹教化」，以期整頓風俗。因此，柳開招降群蠻後，「作〈時鑑〉一篇，刻石以誡之」。大要內容，正是告誡溪洞之雄必須記取「違道致殃，于命取亡。居夷鄰德，處險近賊」的道理，切勿「嘯萬群奸，摧壘倒關」，苟能「謹政防亂，慎行避患」，便可「保爾攸宜，胥樂在時」。（註68）

北宋地方官撰著戒文以垂諸民眾，移風易俗，是常見的現象，如《長編》載戚綸（954-1021）在太宗至道三年（997）徙知太和縣：「民險悍，喜鬪訟，綸作諭民詩五十篇，因時俗耳目之事，以申規誨，老幼多傳誦之。」（註69）柳開垂文以戒，

65. 〈行狀〉，頁316-317。

66. 《長編》卷28，頁642-643。

67. 〈行狀〉，頁317。柳開在全州立下功勳，但同時又因黥徒事件而在淳化二年（991）下獄四個月，仕途再受打擊，這些功勳所發揮的正面意義遂化為烏有。〈行狀〉載其事曰：「淳化元年（990），移知桂州。明年，詔歸。明年，為黥徒訴，入臺獄，貶滁州團練副使。初，公治全也，有僧暨吏教全人誣告公，公効之，撻其背，黥而送京師。至是，二人謂罪不至此，故公當之。」見〈行狀〉，頁317。柳開日後嘗為此作出辯解：「況于蠻夷，并繫軍寨，連群結黨，蠹物害民，本期去彼之根源，不謂陷臣于坑穽。」見《柳開集》卷1〈在滁州上陳情書〉，載《全宋文》卷115，頁565。若柳開所言屬實，則其痛繩犯法部民，目的在於剷除作亂根源，未審何故不為政府認同而免罪？姑存之以俟考。柳開在淳化三年（992）三月責授復州團練副使，四月，移滁州，至淳化四年（993）詔還。

68. 《柳開集》卷10〈時鑒并序〉，載《全宋文》卷124，頁695。張景以柳開有益於世道人心的舉動，尚包括弘揚孝愛之道：「公上書言祖父暨叔母而下，皆未定葬，願得近魏官，謀葬也。許之。秋八月，賜錢二十萬，移邢州。明年，葬尊幼二十三喪，求假歸魏。公遍撫其柩，盡哀而聲不絕者數日，皆自志其墓。魏人以公孝愛之厚，可化于世也。」見〈行狀〉，頁317-318。

69. 《長編》卷41，頁861-862。

相信是受當日風氣影響。(註70)武質文臣改良風俗的貢獻，自非純粹武將所能及；這種有助於朝廷鞏固統治的思想，實難求諸只懂征戰的武臣。可見以武質文臣治理地方，不僅有助於解決武人專擅的問題，對於建立有利於維持政權穩定的價值信念，同樣可以發揮正面作用。

前文提到柳開的軍事貢獻，基本上是他以文臣身份出任地方官時所作。觀柳開一生宦歷，以武臣身份出鎮地方亦有多數。柳開曾說「或生為兵，習于弓矢之勞」為不幸也歟。(註71)他亦嘗在〈上郭太傅書〉自陳：「開本儒官，于兵家事苦不深會。」(註72)未審是自謙之辭，或在他的思想之中確實存在著武不如文的看法。無論如何，能夠牽復柳開的，正是他表面上不太重視的戎務表現，這與宋初文臣的軍事能力一直受到帝王重視有密切關係。

宋初帝王深感外患威脅，亟盼集思廣益，從而更有效地應付外族侵擾問題，影響所及，文臣頗有上書談論兵事的習慣。如太宗在端拱二年（989）正月：「詔文武群臣各陳備邊禦戎之策。」當時發言者眾。除了張洎（934-997）上書目的純粹為了迎合帝意外，當時響應太宗詔令而上書的有溫仲舒（944-1010）、王禹偁和田錫等人。溫仲舒更因「章獨先上」為太宗所悅，被賜以金紫。(註73)部分文官甚至提議朝廷應該文武參用，顯示他們深信儒將的作戰效能不下於武將。孫何（961-1004）在至道三年九月「表獻五議」，當中一議即「參用儒將」：

將者，人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晉、漢至唐，皆選儒臣統兵，當時武臣未有出其右者。五代始分事任，交相是非。古謂元戎無不統攝，爰自近代，又有供軍糧料，隨軍轉運之目。使者往返，託稱上旨，動必中覆，實戾成算。陛下於文儒之中，擇有方略之士，試以邊任委之，勿使小人撓其權，聞外制置一以付之，境內租稅、權利一以與之，監陣先鋒之類悉任偏將，受其節度。文武參用，必致奇績。(註74)

70. 這些影響更廣及至柳開的治家方略。《宋史》稱其「作《家戒》千餘言，刻石以訓諸子」。見《宋史》卷440〈柳開傳〉，頁13028。

71. 《柳開集》卷2〈上大名府王祐學士書〉，載《全宋文》卷116，頁577。

72. 《柳開集》卷5〈上郭太傅書〉，載《全宋文》卷119，頁627。

73. 《長編》卷30，頁666。

74. 《長編》卷42，頁881。

按孫何上書之前，太宗早已採用文資換武職的方式，以文臣出掌邊任；太宗去世後，文臣堪寄戎職的看法依然存在。儘管有人對文臣知軍事政策的實際效果有所保留，但文臣可以發揮軍事作用是時代的普遍認識；^(註 75)有些武將也擁護這種看法，王顯（932-1007）是較為特出的一個。《長編》載景德元年（1004）：「二月辛酉，以王顯知天雄軍府兼駐泊總管。顯上疏，請於文武群臣擇曉邊事者擢為宣徽使，委之方面。」^(註 76)王顯早年被太宗勉以讀書，大概因此而明白儒臣具有多方面的能力。

基於上述背景，柳開的軍事素養，遂能對應時代要求而為他的仕宦生涯發揮振拔之效。雍熙三年（986），太宗用兵幽燕，柳開時任上蔡令，親領縣民運糧京師餉軍，乃乘此機會上書權要以圖牽復。他在〈上參政呂給事書〉談到「方今大發師徒，必有征伐，是非常之時也。國家事繁務眾，文武要人，是非常之便也」，可見他深知國家用兵之際，正是具有軍事素養文臣效命立勳之時，亦是他得以「離此州縣之中，再列班行之末」的大好機會。^(註 77)柳開如此自信，完全建基於個人的出身背景：他生於久為兵爭之地的大名，自少即秉勇武之氣；當地鄰接前線，亦令柳開瞭解契丹戰技。雍熙三年四月，曹彬（931-999）與所部裹五十日糧再往攻涿州：

敵當其前，且行且戰，去城才百里，歷二十日始至。有敵酋領萬騎與米信（928-994）戰，相持不解，俄遣使給言乞降。上蔡令大名柳開督饋餉隨軍，謂信曰：「此兵法所謂無約而請和者也。彼將有謀，急攻之，必勝。」信遲疑不決。踰二日，敵復引兵挑戰。後偵知，果以矢盡，俟取於幽州也。^(註 78)

75. 如田錫在咸平三年三月上疏曰：「臣伏見去年十一月十四日敕文，欲興行武舉，令所司條奏以聞。今年二月一日，又見轉運司行下御史臺牒，限五日內舉員外郎以下見任京朝官有勇武才器者，急速如此，竊慮未得盡理。蓋見往年朝臣中求武勇者，得劉墀、鄭宣等數人，劉墀以易州陷沒契丹，鄭宣卒無勞效。今又朝臣中求人，臣慮朝臣中武勇者少，設使有武勇，多不願在武職。況今限以五日奏舉，若非相諳識，豈易得人？臣恐舉非其人，有誤陛下任使也。」見《長編》卷 46，頁 1002。

76. 彭伯川，《太平治蹟統類》（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0），卷 4〈真宗澶淵通好〉，頁 30 上。

77. 《柳開集》卷 5〈上參政呂給事書〉，載《全宋文》卷 119，頁 621。

78. 《長編》卷 27，頁 613。

〈行狀〉云柳開「見機如此」，以譽其有洞悉先機之能。^(註79)其實柳開熟悉契丹戰技，方可料敵如神，他在〈上王太保書〉道出原委：

兵者以詐行，以奇勝，以謀先，以勇固。失此四者，敗之道也。開生長河朔間，讀書為文之外，好尋前古興亡成敗之跡。自兒童時，復見烈考每每話後唐莊宗迄于晉、漢朝與北虜戰爭之事，歷歷如在眼前。開今夏中隨兵饋糧，北抵涿州。觀其北虜用兵之法，皆如往昔烈考所言。^(註80)

《長編》以涿州之戰發生在雍熙三年四月，而柳開返京師上書太宗，得授殿中侍御史和奉使河北等事，當在四月之後。柳開在涿州戰役之後的言論取向以及知寧邊軍時的表現，張景作以下說明：

公涿州還闕下，乃上書乞從邊軍效死，太宗憐之，復得殿中侍御史，使河北。多言邊事，太宗頗納之。又上書曰：「臣以幽州未歸，匈奴未滅，望陛下于河北用兵之地，賜臣步騎數千，令臣統帥行伍。況臣年今四十，膽氣方高，比之武夫，粗識機便。如此，則得盡臣子忠孝之道。」明年，詔文臣中有武略知兵者，公奉詔，改崇儀使，知寧邊軍。公至治，以仁愛士卒，專訓練，明賞罰。^(註81)

柳開在同年除了上〈上皇帝陳情書〉，自陳比一般武夫高明外，還致書當時知天雄軍府兼都部署的王承衍（952-1003），暢論制敵之道。柳開舉出昔日兵威雄盛、無堅不摧之例：「以朝廷自周世宗取淮南，收秦鳳；太祖皇帝下荆湖，破西川、廣南，滅吳；皇帝平晉與吳越、甌閩，三十年中，兵出即勝，謀動即成。」當代「兵雖多，將雖眾」，惟敗多勝少，原因在於主兵者無視形勢已經出現重大轉變：「其為爭勝之道，視北虜猶視吳、蜀、晉、楚之師，所以開謂其有異而乃失其利也。北虜非吳、蜀、晉、楚之匹也：用非詐也，不能及其心；出非奇也，不能敵其眾；

79. 〈行狀〉，頁315。

80. 《柳開集》卷4〈上王太保書〉，載《全宋文》卷118，頁603。

81. 〈行狀〉，頁315。上書太宗以求統帥行伍全文，收入《柳開集》卷1〈上皇帝陳情書〉，載《全宋文》卷115，頁563-564。過闕獻書事而復為殿中侍御史事，〈與河北都轉運樊諫議書〉亦有提及：「至三年，開逐曹師饋糧伐燕，自涿州迴，過闕下，獻書乞從邊軍效死。上念開前罪無大，故情可憐惜，復得殿中侍御史。是歲也，奉使河北，冬十二月，值王師有瀛州之役，連城陷賊。開以河北事機飛章奏，上恕而納之。」該文收入《柳開集》卷5，載《全宋文》卷119，頁624。

動非謀也，不能防其奸；戰非勇也，不能悍其力。輕而視之，易而行之，非所以利也。」

以上看法，反映柳開雖向太宗說「膽氣方高」，但這不表示他只懂得逞匹夫之勇而不重視審察形勢。相反，他很清楚契丹「非吳、蜀、晉、楚之匹也」，若宋兵與之作戰時不能善用詐、奇、謀、勇，盲目地「輕而視之，易而行之」，必然招致失敗。基於這種看法，柳開乃批評劉廷讓（929-987）與李繼隆（950-1005）兩人在君子館之戰時所犯的過失：

北虜昨自祈溝之役洎此，入數月也。逐我師而迴，乘勝也；念己地之侵，蓄怒也。乘勝而蓄怒，今其來也，必選其勁虜精騎，盡率其群，決入吾境，勢甚銳耳。劉與李不能堅壁清野，備而避之，非善之將者也。譬之惡獸，有暴其巢窟者，退必咆哮攫齧，肆害于物，當此之時，未可制其橫猾也。苟俟其怒心發極之後，從而圖之，可為易耳。（註82）

柳開指出劉廷讓和李繼隆面對契丹精騎傾巢而至、兵勢甚銳之時，並沒有認識到契丹高昂戰意，且配備驍悍騎兵，其況猶如巢窟被毀的猛獸，必然攫齧肆害，宋軍欲制其橫猾，必須「俟其怒心發極之後」，即戰鬥意志下降之時，「從而圖之」，方可奏效。兩人不作此圖，反而在極不利的情況下與敵騎進行野戰，遂為遼軍所乘，使宋軍蒙受更慘重的損失，柳開乃批評他們為「非善之將者也」。

柳開之言，乃是有感而發。北宋軍隊承襲五代的軍事傳統，偏好野戰，崇尚奇襲，面對契丹調動快速、突防力強的龐大騎兵戰鬥群，在戰爭過程中所遇上的組織和作戰風險，已非僵化的軍事指導思想所能處理；戰略文化上的落差，是造成宋軍在早期與契丹交手時迭遭敗創的主要原因。（註83）誠然，北宋對遼作戰時，野戰的作用也不能忽視；這種作戰方式不但用於攘敵，對於收復幽燕，更是不可缺少。關於這一點，本文的審查意見書作如下說明：

宋人如何對付契丹的騎兵，應針對不同的形勢而採取不同的戰略，有時可用城守〔堅壁清野〕，有時可用野戰，有時可用伏擊，不一而足，各有

82. 《柳開集》卷4〈上王太保書〉，載《全宋文》卷118，頁603-604。

83. 曾瑞龍對支配宋軍戰略文化的淵源及轉變有詳盡而精闢的見解，見氏著《經略幽燕》。

利弊；如一味城守，或可保存軍力，但遼騎縱橫擄掠，百姓受害至鉅。澶淵之役，遼師能夠快速深入，恣意破壞，河北數州幾成廢墟，正是因為宋將只知城守，不敢出戰。戰場在國外，死傷的是外國的百姓，戰場在國內，死傷的是本國的百姓，在設定戰略時，就有不同的考慮。研究戰爭，不能只看軍隊，還要看其他因素，如百姓的財產性命，甚至文化的保存〔如二次世界大戰時巴黎投降以避免文化浩劫〕等，才能謂之戰略文化。歷史學人以成敗論功過，以野戰失利而謂野戰不合時宜，以城守得利而謂城守可恃，不過是後見之明。不用野戰，如何收復幽燕？如何阻遏遼直抵國門？

引文談及宋人對戰術和戰略的理解、運用以及兩者的互動關係，的確是一個很有探討發揮價值的研究領域，曾瑞龍在這個領域嘗作過一番努力。但正如引文指出，城守、野戰兩者與守衛國土及收復幽燕應作怎麼樣的協調，仍屬有待探究的問題。筆者很同意只懂按甲守陴，無視國境遭敵騎蹂躪，絕非對付敵人的正確方法。^(註 84)由於拙文的重點不是探討戰略文化，所以本文將集中解說柳開在雍熙四年發表上述意見時宋廷所面對的軍事困局。

柳開批評劉廷讓等人用兵不當時，宋軍已迭遭高粱河、歧溝關和君子館諸役重創，野戰能力大削，則柳開強調持重而行，是完全可以理解；審慎態度，具見於他向王承衍所作的建議：「今聞北虜尚在瀛州界內，開計其來也，肯此而退乎？虜使間者南入深、冀，先行偵察也，勿以其寂然無聲，謂其息也，此乃謀其往耳；勿以其居然不動，謂其止也，此乃窺其便耳。」^(註 85)可是，柳開並不純粹以城守為是。相反，他亦表現出與敵騎在原野爭勝的意志：

84. 五代之世，中原王朝與契丹戰爭的過程中，嘗因某些將領逃避野戰而致生靈塗炭。例如杜重威（？-948）在後晉任成德軍節度使：「少帝嗣位，與契丹絕好，契丹主連年伐晉，重威但閉壁自守。部內城邑相繼破陷，一境生靈受屠戮，重威但居方面，未嘗以一士一騎救之。每敵騎數十驅漢人千萬過城下，如入無人之境，重威但登陴注目，略無邀取之意。」見薛居正（912-981）等撰，《舊五代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卷 109〈杜重威傳〉，頁 1434。到了北宋，類似情況也出現過。真宗咸平二年十二月：「潛屯於定州，緣邊城堡悉飛書告急，潛麾下步騎凡八萬餘，咸自置鐵撾、鐵捶，急欲擊敵。潛畏懦，閉門自守，將校請戰者輒醜言詈之。無何，敵破狼山諸寨，悉銳攻威虜，兩晝夜不勝，遂引兵略寧邊軍，入祁、趙，大縱抄劫，游騎出邢、洺間，百姓驚擾，攜挈老幼爭入城郭，鎮、定路不通者踰月。」傳潛為此深受非議，最後更丟了鎮定高陽關路行營都部署之職。詳見《長編》，卷 45，頁 972。

85. 《柳開集》卷 4〈上王太保書〉，載《全宋文》卷 118，頁 604。

今明公承命而來，禁旅旋至，開欲乞候兵師到此，即請盡出甲兵，多持旌旗，緩行而前，至府北屬縣已來，揚聲云大軍數十萬相次而至，夜即多以火鼓，張其兵勢，仍請分命兩道而行。北面城邑軍兵，聞必增氣。若賊虜有南顧之心，聞之必未敢輕易而進；若賊虜本無南顧之心，此行不遠而迴，又且無害于我。況大河之北，郡縣纍纍，民居相鄰，戶僅百萬，聞王師而大至，其心寧不頓得安乎！俟其旬浹間，城池修完，北虜不進，即請明公相度乞聖駕行幸天雄軍駐蹕，而後進軍，漸抵貝、冀，聲援邊方。若得北虜退歸，河朔無事，即却賊安邊之功，盡成明公之勛業也。（註86）

柳開很明白野戰畢竟是塞外民族長技，中原軍隊在原野與胡騎周旋，必須慎重其事，不爭尺寸之功，以免貪逐小利而致戰鬥隊形離析渙散，為敵騎所乘，而且必須在集中優勢兵力的情況下才與胡騎決戰，若優勢兵力可收不戰而令敵人知難而退，當然是最理想不過了。基於這種思路，柳開建議王承衍靜候援兵到臨後，才張開兵勢，持重而行，切勿與遼兵競利，而落其彀中。

柳開在雍熙四年五月為太宗授以崇儀使之秩時，「方在邢州訓練兵卒」，到同年七月才到寧邊軍上任，端拱元年（988）五月詔替歸京，改知全州。（註87）柳開以文資換武職，出知寧邊軍事，《長編》亦有記載：「上亦欲並用文武，戡定寇亂，乃詔文臣中有武略知兵者許換秩，故開與〔鄭〕宣等俱被此命。」（註88）寧邊軍的建

86. 《柳開集》卷4〈上王太保書〉，載《全宋文》卷118，頁604。也許這些論調與當日瀾漫軍中的野戰取向和軍事冒險等普遍觀念相左，柳開乃強調自己「儒學議兵，不識遠大，僭易聞啓，惶懼實深」。盼這一類謙卑之言可消除因人事衝突而引致的仕途障礙。

87. 《柳開集》卷5〈與河北都轉運樊諫議書〉，載《全宋文》卷119，頁624。

88. 《長編》卷28，頁637。另見徐松（1781-1848），《宋會要輯稿》（北京：中華書局，1957），冊95〈職官61〉，頁3755。Peter K. Bol亦注意到柳開以文官身分出鎮邊郡的現象，見氏著 *This Culture of Ours*, p. 162。柳開等人換秩出知邊地史事，筆者嘗著文考述，見拙作，〈易州失陷年月考——兼論南宋至清編纂北宋歷史的特色〉，收入楊炎廷前見書，頁1-19。換秩原因，李燾在〈小字夾注〉解釋其詳：「《實錄》及開本傳皆云：先是五代戰爭，方鎮、刺史皆用武臣，率不曉政事，人受其禍，上欲兼用文士，漸復舊制，故先擢鄭宣等為內職。此事恐非當時本意，蓋以文臣治州郡自太祖始矣，及今而復圖之，不亦晚乎！按張景所為開行狀云：詔舉文臣中有武略知兵者，開奉詔，改崇儀使。然則開等換秩，自以時方治兵講武，急於將帥耳，非為武臣不曉政事，人受其禍也。《實錄》既收此詔，而開及劉慶姓名又不與鄭宣等俱見，疑脫誤。今輒用張景行狀及《會要》刪修。《會要》亦稱慶等或負勇敢之氣，能幹戎事，故換秩，決知《實錄》所稱，非當時本意明矣。」《宋史》記載這件事時，相信是取材自《實錄》之文：「上以五代戰爭以來，自節鎮至刺史皆用武臣，多不曉政事，人受其弊。欲兼用文士，乃以侍御史鄭宣、戶部員外郎趙載、司門員外郎劉墀並為如京使，左拾遺劉慶為西京作坊使，開為崇儀使、知寧邊軍。」見《宋史》

置背景，〈行狀〉作如下記載：「寧邊者，定州博野縣也，以其控要，始建軍，以公莅之。」^(註 89)柳開被太宗任以極邊之地，多少反映太宗對他的軍事才具滿有信心。

柳開自云在寧邊軍時：「奮空拳而冒白刃，坐虎口而斷賊臂」。^(註 90)這些大概是誇張之言，以比喻當地戰況異常凶險；而更值得注意的，是柳開不認為自己被太宗疏遠才被派到寧邊軍，故能勉所職而立下殊勳。立勳之由，並非銳意攻戰，而在於持重制敵：「以仁愛士卒，專訓練，明賞罰。」治軍嚴整之外，料敵亦有可觀之處：

〔雍熙四年〕冬十二月，沿邊州郡相馳告以契丹將犯邊，急設備。居數日，連受八十餘牒，公獨不告。時宣徽使郭公守文主軍陣，公馳書陳，料蕃賊必不犯邊。契丹果不動，其料敵如此。^(註 91)

無獨有偶，料契丹必不犯邊的王嗣宗（944-1012）亦為武質文臣。^(註 92)此見當日這一類文官對軍事的認識，實不可視以等閒。有趣的是，柳開以契丹不會犯邊的其中原因，在於天象所示，他在〈上郭太傅書〉闡釋其說：

開昨獨不曾有狀申報蕃賊恐入界者，開緣料得蕃賊此者不來犯邊。其事有五：一，天順；二，時晚；三，地困；四，人牢；五，勢怯。天順者何？兵主殺，殺主陰，陰主凄慘、寒烈、晦冥、昏霾。今冬已來，天日晴暖，郁郁如春，無嚴風，無苦雪，無慘霧。晝夜視之，彼賊上無雲無氣；每每南首而望，我雲如堤如林，橫亘天際，極高極厚。河冰不堅，隨日融釋；太陰夜暈，胡星盡掩。凡兵動有戰，破軍殺將，即天須示變于人。今上天如此，是為天順，而開所以知其不來者，此為一也。^(註 93)

卷 440 〈柳開傳〉，頁 13024-13025。這條史料，可以作為瞭解《宋史》取材的途徑，同時亦道出編纂《宋史》的史臣沒有參考李燾在《長編》所作的考證。

89. 〈行狀〉，頁 316。

90. 《柳開集》卷 5 〈與河北都轉運樊諫議書〉，載《全宋文》卷 119，頁 624。

91. 〈行狀〉，頁 315-316。

92. 《長編》卷 28，頁 642。

93. 《柳開集》卷 5 〈上郭太傅書〉，載《全宋文》卷 119，頁 627。柳開根據天文星象議論兵事，亦見於咸平二年（999）十二月所上的〈奏事宜表〉，這時距離去世僅有三個月，可見這種對契丹用兵動向的理解方式，可謂與其仕宦生涯相終始。表文詳見《柳開集》卷 1，載《全宋文》卷 115，頁 572-575。

以天象作為料敵根據，在武將群中亦時有所見。《宋史》載張永德（928-1000）「明天文術」，他出判并州兼并代都部署時：「嘗與僚佐會食，有報遼兵寇州境者，永德用《太白萬勝訣》占之，語坐客曰：『彼雖以年月便利，乘金而來，反值歲星對逆，兵家大忌，必敗。』未幾，折御卿捷報至，眾始歎伏。」^{〔註 94〕}若張永德理解正確，遼方似乎也藉著這種方式決定何時用兵。柳開在寧邊軍最為宋人津津樂道的事蹟，是收復幽州的嘗試：

白萬德者，鎮州真定人也，為契丹貴人，沿界蕃族七百餘帳，皆萬德往來轄之。博野之豪傑，或為萬德姻族故人者，往往出入界上，以見萬德。公潛知之，乃陰結豪傑，漸與親密，夜引豪傑入臥內，與之飲，謂曰：「汝能為我說萬德，則幽州可立取，汝必為貴人也。」豪傑許諾。公使謂萬德曰：「中原失幽、薊，六十餘年。今朝廷大興師眾，必將取之。爾生中國，則朝廷為父母之邦，奈何棄禮義而事胡虜？爾能南歸，則分茅裂土，為公為侯，世世不絕，功在史冊，非爾何人也！」萬德大喜，使豪傑請約。公再使，謂萬德曰：「必也順動，爾始終受虜文命，可先示我。我崇儀之命，亦為爾質。」豪傑去，未返，會有詔罷公歸闕。其夜豪傑返，公曰：「爾遽止，吾去矣。」因歎曰：「吾將使萬德為內應，而密奏于上。我先以輕騎直走，掩其不備，命諸將分道提精兵疾入，則幽州可下也。不集吾事者，非天矣夫！」^{〔註 95〕}

《長編》以其事確曾發生，但敘述平淡得多：

有白萬德者，真定人，為契丹貴將，統緣邊兵七百餘帳，寧邊有豪傑，即萬德姻族，往往出境外見之。柳開因使說萬德為內應，挈幽州納王師，許以裂地封侯之賞，萬德許諾，來請師期。使未及還，會詔徙開知全州，事遂寢。^{〔註 96〕}

李燾在〈小字夾注〉解釋採用平淡敘事方式的原因：「白萬德事本傳不載，《真宗

94.《宋史》卷 255〈張永德傳〉，頁 8917。

95.〈行狀〉，頁 316。

96.《長編》卷 28，頁 642。

實錄》有之，蓋出張景所作行狀，詞太夸，《實錄》稍刪之，今從《實錄》。」^(註 97)按收復幽燕乃北宋舉國所關注的頭等大事，宋人談論柳開的壯舉時，每多帶著濃厚的國家民族感情，稱曰：「幽薊八州，陷北虜幾二百年，其閒，英主賢臣欲圖收復，功垂成而輒廢者三矣，此豪傑之士每每深嗟而痛惜。」柳開亦因「易地而罷」，未竟其功：「河朔之人，逮今為憾。」^(註 98)

這一類言論，表達了宋人對收復幽燕失利一事耿耿於懷，乃著力美化與此有關的人物，柳開在這件事情所扮演的角色，遂在這些心理因素影響下被宋人廣泛地浪漫化和英雄化。柳開豪邁任俠之風，是他能夠結好邊豪的重要助力；建議輕騎馳襲幽州，亦與當日俠客犯險好鬥的作風吻合。這也說明柳開雖然力主持重行軍以待遼師，惟涉及塑造個人英雄形象之時，也不惜以身犯險，甘願投身於軍事冒險的時代潮流而不顧。

柳開以武官身份出鎮邊郡，還見於淳化四年。是年，他在滁州為朝廷召還，復授崇儀使，出知環州。^(註 99)〈行狀〉述其在環州的政績曰：

州與吐蕃接。先是，吐蕃常與環人貿易，環人悉詐其斗秤，其物直之增減，與漢價不類，蕃漢民多以此鬥。官司黨漢而虐蕃，故蕃情常怨于我。公至，平其斗秤，一其物直，擒民之欺蕃者刑之。蕃情翕然愛公，每見公出，歡呼號喜。^(註 100)

在蕃漢雜居的邊郡為官，得蕃情是安靖轄境的重要條件，在這種事情上言，武質文臣自然較純粹文臣更能勝任。觀柳開在環州的施為，很明顯為了安撫蕃人而改變以往偏袒漢人的做法，依律懲處犯事的漢人。然而，漢族始終是邊州居民的主體，柳開安撫蕃人之餘，對居於當地的漢人也施行惠政，這一點在他知邠州時表露無遺：

明年春，移邠州。民方困輦饋，初運稍絕，再運又起，而發其半，富民

97. 《長編》卷 28，頁 643。

98. 《澠水燕談錄》卷 9，頁 111。文瑩描述柳開謀取幽州事時，戲劇性更強，皆可反映宋人以「不集其事」為憾。見文瑩，《湘山野錄·續錄》（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 78-79。

99. 《柳開年譜》，頁 239-240。

100. 〈行狀〉，頁 317。柳開在環州的表現，可參考濱田直也，前揭文，頁 37。

大賈悉蕩其業。轉運使又遣使至，起第三運，皆赴環州。百姓惶駭，聚數千人，爭入州署號訴，曰：「力已不逮，願就死于公矣。」與使者起立，厲聲諭之曰：「爾無慮，必為爾罷之。」因命吏遺書于運使曰：「聞近離環州，知其糧草如不增，大兵可有四年之蓄。今蠶農方作，再運半發，老幼疲蔽，畜乘殆竭，奈何又苦之？如不罷，開即馳詣闕言于上前。」三日，吏迴，罷之。邠民大呼，叩頭感公，多泣下者。闔境圖公像拜之。冬，詔歸，邠民擁城門不得出，因夜潛去。（註101）

《長編》亦記載這件史事，內容與〈行狀〉大致相同，李燾在〈小字夾注〉解釋是「據張景〈行狀〉」的原故。（註102）反映張景所言並無虛美誇張，柳開知邠州時確實愛惜民力，甚有為民請命的循吏風采。柳開在西境不獨專意於地方管治，對當地的軍事形勢亦甚留意；觀察所得，成為日後上書獻策的內容。（註103）要言之，柳開以武官身份出鎮邊郡，不只在軍事上有表現，在民政方面的貢獻仍值得注意。允文允武的才具，是大部分武將所不能比擬的。

太宗去世後，〈行狀〉對柳開的軍事生涯有以下記載：「太宗升遐，加如京使。明年，今上改元咸平，公秩滿入覲，尋出知代州。既受命，又上書言邊事，及諫省職官、訓練士卒。書奏，上頗悅之。」（註104）所謂「上書言邊事」，蓋指柳開所上的〈上言時政表〉。（註105）柳開在文中強調軍事訓練的重要性，從他的軍事生涯歷程觀之，這種持重想法可謂貫徹始終。柳開雖為真宗所喜，卻在屯所與部眾不協而要求調任：

公至代，代城多壞不葺，公曰：「昔太宗躬被戎衣，而有此地。咫尺寇敵至，何以禦之？」代之將帥，耻不能先公之謀，皆沮其議曰：「邊寇

101. 〈行狀〉，頁317。另見濱田直也，前揭文，頁37。

102. 《長編》卷35，頁776。

103. 柳開知環州日，對西境軍事形勢觀察所作的文字，見《柳開集》卷1〈上言時政表〉，載《全宋文》卷115，頁567。《宋史》以柳開上書，在知代州時事，即真宗咸平元年（998）。見《宋史》卷440〈柳開傳〉，頁13025-13027。柳開在邊區治民的同時，亦能對軍事作出貢獻，使中央政府減輕對武人的倚賴，這正是武質文臣的作用和價值。

104. 〈行狀〉，頁318。

105. 《柳開集》卷1〈上言時政表〉，載《全宋文》卷115，頁569。這篇文字有云「昔日荷太祖太宗見知，今日蒙聖主聖恩任用」，可見是真宗即位後所作。祝尙書引用薛應旂《宋元通鑑》，以該文成於咸平元年十月。見《柳開年譜》，頁246。

不動，勞民不可。」公曰：「俟其動，何及也？」力奏而葺之。諸將怨公。公謂姪滉曰：「吾觀胡星有光，雲氣多從北來，犯我境上，寇將至也。吾聞師克在和，今諸將怨我，若有動，彼必構危于我也。」因奏曰：「代為重地，臣不材，不可居，願得一小郡治之。」明年夏移忻州。秋，契丹果動。（註106）

柳開好言兵事，但諷刺的是他屢與軍將相處不來。出知代州前，在貝州已有不愉快的紀錄。（註107）貝州之爭事出何因，已難詳考；代州失歡，明顯是策略不同所致。前文嘗述柳開在雍熙四年上書王承衍，要旨在於避免兵力厚集之前與遼騎進行野戰，柳開既持審慎態度，自然不會同意代州駐軍只重野戰而不重城守的做法。柳開主張修葺城池，目的在於藉著防禦建築，以重挫契丹騎兵初臨時的銳氣；野戰失利，更可憑城據守，以避契丹兵鋒，不致頓兵草野而盡為敵騎屠戮。惟修葺城池作為禦敵之資，往往被視為保守欠缺積極，不為崇尚野戰的軍人所喜，此實為雙方忿爭的根本原因。所謂「師克在和」，諸將因不樂修葺城壘戰具而「沮議不協」，柳開縱使不看天文，也明白不能再在代州立足，只好請求徙調忻州。

表面看來，以上事例似可為柳開反對野戰加添證據，但實際並不如此。《長編》載咸平二年十月柳開所上的奏疏曰：

伏自八月以來，聞河北邊上敵人屯結甚眾，又數侵犯雁門瓶形寨、寧化軍。度其姦謀，必不輕退，深恐大寒之際，契丹轉肆衝突。臣愚乞陛下郊禋既畢，慶賞才行，行五七日間，速起聖駕，徑至鎮州，躬御六師，奮揚威武，勿生遲疑之慮，勿聽猶豫之謀，周世宗及我太祖、太宗近事，皆可法也。況陛下諒陰三年，禮無違者，復此順動，其誰敢當！聖駕若過河北，契丹當自引退，四夷八蠻，無思不服，政在此舉矣。（註108）

如前所述，柳開並不反對野戰，但強調必須厚集兵力的情況下以持重態度進行；

106. 〈行狀〉，頁318。文中所云「胡星」，又稱「昴宿」，見《宋史》卷440〈柳開傳〉，頁13027。

107. 〈行狀〉載柳開與將領失歡之事曰：「太平興國九年，〔從潤州〕詔歸，出貝州，加殿中侍御史。明年，坐與兵馬都監執公事爭鬥，貶上蔡令，時雍熙二年也。」（頁315）〈上參政呂給事書〉亦云：「開以兵馬都監趙嘉進監押翟廷玉，以官事苦相侵逼，致各忿爭，天怒降威，追官作宰，奪爵顛沛，極不忍言。」見《柳開集》卷5，載《全宋文》卷119，頁620。

108. 《長編》，卷45，頁967。

柳開在他的仕宦生涯之中，一直貫徹著這個看法。引文提及周世宗、宋太祖和宋太宗三位帝王，皆有躬身戰陣的壯舉，根據柳開的意見，真宗御駕更須直抵前緣重地鎮州，以便發揮「奮揚威武」之效。則柳開對於野戰的重視，亦可謂不言而喻。〈行狀〉以代州事件，沒有動搖真宗對柳開軍事能力的信心，故咸平三年正月真宗自河北返京師後：「以契丹入寇，皆由雄、霸、滄州路，詔公知滄州，兼兵馬鈐轄。」這個已是柳開戎馬生涯的最後任命：「二月，公受命，疽發于首，自忻乘肩輿至并州。三月有六日，卒于并，年五十有四。」^(註 109)

四、柳開的行事作風與仕途發展

綜觀柳開的仕途發展，大概可用「不顯」兩個字來形容。這個論斷，建基於以下二個因素：柳開怎樣看自己的仕宦生涯；與柳開活動時代相若的武質文臣作出比較。首先，柳開名列《宋史·文苑傳》，只可說明他在文壇有不錯的聲譽，與仕途順逆沒有必然關係；犯過寬免是當日的慣常做法，不足以顯示太宗對柳開特別優容。^(註 110)柳開屢言邊事，亦不外乎是他在仕途失意時希望得到振拔的做法。柳開對於自己的道德文章以至功名抱負，一直自視很高，期望亦大。早在中第之前，柳開已經誇下海口，自言「口誦古聖賢人之書，心紀古聖賢人之法，作事于世，為民善惡」，並自陳倘若「天與其命，一朝一夕，使主張斯文，教民歸于古道」。^(註 111)致君堯舜的想法，可謂躍然紙上。

但柳開入仕以後，長年在內郡和邊區任職，未嘗一日在中央政府執掌要務，這又怎可能實現他的心中所想？不足之感，具見於他在淳化五年（994）知邠州時所上的陳情表。他在表中不獨以「一生同蹇塞之人」自況，更請求太宗：「乞迴睿睭，抽歸神京。換臣一給諫卿監之官，列在股肱耳目之秩，必能助陛下行非之好事，必能佐陛下固不拔之丕基。」^(註 112)按柳開知邠州時，為政甚有可觀，而且

109. 〈行狀〉，頁 318。

110. 例如王侁（？-994）因陳家谷之敗，削籍為民，但後來也得復職。詳見《宋史》卷 274 〈王侁傳〉，頁 9364。整體而言，在太宗朝被貶謫的文武臣僚，每多有重被召用的機會。見拙作〈「誠兒姪八百字」與范質生平考述：論北宋家訓詩的社會功能及史料價值〉，載《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新第 11 期（2002），頁 191。

111. 《柳開集》卷 3 〈上符興州書〉，載《全宋文》卷 117，頁 602。

112. 《柳開集》卷 1 〈知邠州上陳情表〉，載《全宋文》卷 115，頁 566。

相對於他個人以往的職任而言，名位亦高，但他不以此為美事，而汲汲於要求太宗把他調回京師，可見他不以邊任為仕宦目標，情願在中央政府擔當給諫卿監這一類並不算得上顯要的位置。

根據柳開的解釋，這類職任可以作為帝王的股肱耳目，必能助成諸等好事。柳開真正所想是否如此，已難詳知，但不以邊任為佳，是顯而易見的。復次，柳開任職知州，官至如京使，相對於一生困於縣職的卑官來說，柳開的際遇當然不算坎坷，但較諸當日有名的武質文臣，他的名位實不算高，甚至可以說不甚得意。（註113）拙文以柳開仕宦不顯，實信而有據。

柳開中第之前，已經說思想和文章皆受聖賢影響，並以繼承和弘揚儒家道統為己任，他〈應責〉篇中自詡：「吾之道，孔子、孟軻、揚雄、韓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軻、揚雄、韓愈之文也。」（註114）發為議論之餘，柳開對維護綱常名教盡過一些努力，在潤州重修文宣王廟，正是一例。（註115）張景為柳開撰寫〈行狀〉時，為他一生的行事作風和學術思想作出以下總結：

公好賓客，樂道人善，不以己之能而揚人之不能也。嘗謂張景曰：「吾于《書》，止愛〈堯典〉、〈禹貢〉、〈洪範〉。斯四〔三？〕篇，非孔子不能著之。餘則立言者可跂及矣。《詩》之〈大雅〉、〈頌〉，《易》之爻、象，

113. 與柳開同時代的武質文臣王嗣宗，歷京西、河東、淮南轉運使，嘗知永興軍，並授大同節度使、知許州；中央官任方面，他歷三司戶部使、御史中丞、樞密副使。卒諡景莊。另一位是張詠（946-1015），官至樞密直學士、同知銀臺封駁司、掌三班院及領登聞檢院。在地方歷任荆湖北路轉運使，嘗出鎮益郡、永興軍等大藩，後為昇宣等十州安撫使。卒諡忠定。張齊賢亦為宋初著名武質文臣，歷任簽書樞密院事、樞密副使、參知政事，復拜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地方官歷，先後任職江南西路轉運使、涇原等州安撫經略使，改判永興軍、知青州、出判河陽。卒贈司徒，諡文定。可見三人在世時不僅屢任要職，死後更得朝廷贈以諡號；這些榮耀，實非柳開可以望其項背。

114. 《柳開集》卷8〈應責〉，載《全宋文》卷122，頁662-663。祝尚書根據柳開在文中自云「吾今栖栖草野，位不及身」，推測成文「當在入仕之前，確年不可考」，姑置於乾德三年（965），柳開時年十九。見《柳開年譜》，頁212。這篇文字的要旨，誠如祝尚書所言：「本文是柳開早年號召古文的綱領，然而以文、道合一，偏重道統，持論偏頗。」見《柳開年譜》，頁213。類似的主張，亦載於柳開所著的其他篇章，如〈上符興州書〉曰：「口誦古聖賢人之書，心紀古聖賢人之法，作事于世，為民善惡。」見《柳開集》卷3〈上符興州書〉，載《全宋文》卷117，頁602。為官多年後，柳開對道統之論仍舊樂此不疲：「開所專于古文者三十年矣，始學韓愈氏，傳周公、孔子之道，尊尊而親親，善善而惡惡，用之即施教化于天下以利萬物，不用之即成其書垂之無窮，要其令名。開于其儒為文者，庶乎近于古人矣。」見《柳開集》卷5〈與廣南西路採訪司諫劉昌言書〉，載《全宋文》卷119，頁629。

115. 柳開在〈潤州重修文宣王廟碑文〉記述其事：「太平興國五年冬，開自常州知軍州事授敕知此州。吏盜貪贏，檢夷澄育。八年，政事簡，秋八月哉生明，撤舊創新，告遷其廟。自顏子及孟子已下門人大儒之像，各塑續配享于座。厥功成，乃刻辭于石以紀之。」見《柳開集》卷10〈潤州重修文宣王廟碑文〉，載《全宋文》卷124，頁694。

其深焉，餘不為深也。」公于經籍，皆極聖人之心膺，況經之下哉。歷代之興亡治亂，星辰、氣候、山川、地理，如示諸掌。頗究《陰符》、《素書》，孫武之術，故其道不滯于物。(註116)

前文談及宋初亟需任用武質文人，柳開的儒學訓練和軍事素養，可謂完全符合時代要求，理論上言，他當有一番不凡際遇，但事實並不如此。(註117)柳開自應舉到日後開展仕途，遇上很多障礙而致仕宦不顯。蹇於遭逢，每多由於自己的行事作風所致。自少年時代開始，柳開以寫作古文為榮，而且頗事標榜。張景述其況曰：

初，唐末構亂，朱、李扼河相持，魏為干戈之地，文儒蕩然，學者名為儒，不知為儒之謂。公凡誦經籍，不從講學，不由疏義，悉曉其大旨。注解之流，多為其指摘，是從百家之說。漢、魏迄隋、唐間，文史悉能閱之。天水趙生，老儒也，持韓愈文數十篇授公曰：「質而不麗，意若難曉，子詳之何如？」公一覽，不能捨，歎曰：「唐有斯文哉！其餘不足觀也。」因為文章，直以韓為宗尚。時韓之道獨行于公，遂名肩愈，字紹先，又有意于子厚矣。韓之道大行于今，自公始也。公方以述撰為志，博採世之逸事，居魏之東，著《野史》；自號東郊野夫，作《東郊野夫傳》。年踰二十，慕文中子王通續經，且不得見，故經籍之篇有亡其辭者，輒補之，自號補亡先生，作《補亡先生傳》，遂改今名今字，其意謂「開古堅賢之道于時也，必欲開之為塗矣。」今《野史》、《補亡》雖且不存，而《野夫》、《先生》二傳俱在，足以觀其志焉。(註118)

引文清楚道出古文非時所尚。因此，柳開寫作這一類文體，也許可以達到自我滿足，對舉業而言，卻適足其累。時人既以中第入仕為美，柳開也希望藉舉業以開展仕途。《石林燕語》曰：

116. 〈行狀〉，頁318-319。

117. 陳峰亦嘗描述柳開以文人而兼具武質的形象，以及在仕宦生涯中所建立的軍功。由於陳氏倡議崇文抑武之說，所以他對柳開仕宦不顯的評語是：「當天子在朝廷高揚『崇文抑武』大旗的時候，當大批儒臣在道路上將武將的車馬擠到狹隘的街巷裏時，一個希冀用武功來立身、發展的文官，自然就是不識時務的倒運者。」見《武士的悲哀》，頁98。這個看法與筆者的論點不同，詳見下文。

118. 〈行狀〉，頁313-314。

國朝取士，猶用唐故事，禮部放榜。柳開少學古文，有盛名，而不工詞賦，累舉不第。開寶六年（973），李文正昉知舉，被黜下第。徐士廉擊鼓自列，詔盧多遜（934-985）即講武殿覆試，於是再取宋準而下二十六人，自是遂為故事。再試自此始。然時開復不預，多遜為言開英雄之士，不工篆刻，故考校不及。太祖即召對，大悅，遂特賜及第。（註119）

祝尙書以《石林燕語》「謂柳開係『特賜及第』，不實，汪應辰〈石林燕語辨〉已言其非」。（註120）按汪應辰的論據有二：覆試的考官不是盧多遜；宋準並非覆試時才被取錄。（註121）前者甚是，惟第二點似可作更進一步說明：宋準雖在李昉主考時中第，但太祖下令進行覆試時，他名列參加覆試的一百九十五人之中而再中舉。由於宋準表現優異，太祖「又賜準錢二十萬，以張宴會」。（註122）至於柳開，前引《石林燕語》未見提及，汪應辰不應單憑史料中出現盧多遜當覆試考官及宋準中第次數誤失，而否定柳開曾經落第的說法。柳開嘗自言：「太祖即命禮部試所中、不中貢舉人到于殿廷試之，得百有二十七人，賜登高第，開幸在其數。」（註123）觀其沒有矜誇自己兩次考試皆中選，而籠統地說幸在其數，筆者相信他在覆試才中第，《石林燕語》以其應試遇上挫折，實未始無因。

柳開入仕不久，即遭貶謫之困，但他畢竟年青，對前路充滿著憧憬，沒有因被貶而損其雄傑氣慨。隨著年歲增加，柳開初入仕時所表現的不自貴重顧藉作風漸漸消失，取而代之者乃仕宦不顯而引發的牢騷。細檢柳開文集所載，他嘗因仕途艱難而四出求助，當權要及同儕幫不上忙時，柳開更直接上書太宗請求牽復，

119. 葉夢得，《石林燕語》（北京：中華書局，1984），卷8，頁113。柳開為了舉業而多番致書權要，請求薦拔。《宋史》曰：「王祐知大名，開以文贊大蒙賞激。楊昭儉（902-977）、盧多遜並加延獎。」見《宋史》卷440〈柳開傳〉，頁13024。據柳開現存文字，其一共四次上書王祐，分別是〈上大名府王祐學士書〉、〈上王學士第二書〉、〈上王學士第三書〉及〈上王學士第四書〉，收入《柳開集》卷2，載《全宋文》卷115，頁577-584。柳開所致書的人物之中，有些不見名於史傳。《柳開集》中收錄了〈與范員外書〉，致書年代和范員外是何許人，已不能詳考，故《柳開年譜》只將這篇文章繫於開寶五年，而稱：「此當是贊文以求知，蓋在欲舉進士時，因置於此。」見《柳開年譜》，頁220。柳開以文干謁楊昭儉和盧多遜，〈行狀〉亦有談及：「及游場屋，攜文詣故兵部尚書楊公昭儉，楊公曰：『子之文章，世無如者已二百年餘矣。』」崖相盧公方在翰林，一見公，謂公「奇士無敵」。見〈行狀〉，頁314。這番稱譽，也許正是盧多遜在太祖面前為柳開說項的背景。《柳開集》收錄了〈上盧學士書〉，載《全宋文》卷119，頁618-619。

120. 《柳開年譜》，頁223。

121. 《石林燕語》，〈附錄1·石林燕語辨〉，頁215。

122. 《長編》卷14，頁297-298。

123. 《柳開集》卷5〈與鄭景宗書〉，載《全宋文》卷119，頁626。

但成效並不顯著。(註 124)柳開在〈知邠州上陳情表〉向太宗訴說苦況：

臣千載逢聖明之代，一生同蹇塞之人。不得在霸府隨龍，不得向御前及第。徒為散冗，虛抱忠貞。曾學文學，愛揚雄、孟軻之述作；少知兵略，識吳起、孫武之機鈴。與臣同時者，大半淪亡；比臣後來者，盡皆榮貴。惟臣薄命，止及常人，家不免于貧窮，身不免于困滯。(註 125)

柳開訴苦之餘，亦解釋自己為何既「千載逢聖明之代」，最後仍落得「一生同蹇塞之人」下場的原因，在於「不得在霸府隨龍，不得向御前及第」。柳開所言，驟眼看上去似乎有點道理。《長編》記載給事中夏侯嶠（933-1004）在至道三年八月被擢為樞密副使，理由是「嶠仕藩府最舊，故首擢用矣」。(註 126)至於在太宗朝御前及第而勳業有所成就的官員，人數亦多。(註 127)然而，柳開所言亦有不符合事實之處：並非所有霸府舊臣都官運亨通，有些更死於貶所；(註 128)也不是所有非太宗門生都一無所成，例如王嗣宗於太祖朝登進士第，在太宗朝屢任劇職，甚受委遇。(註 129)柳開仕途不副所望，個人的行事作風也許需要負上很大責任。

柳開自云為了將自己改變成純儒，乃改掉「機譎為尚」的習慣：「乾德戊辰（968）中，遂著《東郊書》百篇，大以機譎為尚，功將餘半，一旦悉出焚之，曰：『先師所不許者也，吾本習經，反雜家流乎？』眾聞之，益謂不可測度矣。」經過長期的儒學浸淫，柳開自覺處事作風已符合儒者的理想形象：「性渾然，樸而不滯，淳而不昧，柔知其進，剛識其退。」(註 130)儘管柳開自陳甚力，他的行事作風並沒有實質改變。他在潤州嘗對惑亂禮法的「名教罪人」揮刃相向，這個正是他的友人胡旦：

124. 祝尚書對柳開致書向太宗、權要和同輩求助曾作詳細說明，見《柳開年譜》。

125. 《柳開集》卷 1 〈知邠州上陳情表〉，載《全宋文》卷 115，頁 566。柳開因仕宦不振而作的情緒宣洩，具見於〈再與韓洎書〉，收入《柳開集》卷 6，載《全宋文》卷 120，頁 635。

126. 《長編》卷 41，頁 876。有關太宗藩邸舊臣及他們的事蹟，可參考蔣復璁，〈宋太宗晉邸幕府考〉，《大陸雜誌》30 卷 3 期（1965），頁 14-23。

127. 何冠環以太平興國三年中第士人的政治生涯作個案研究，詳述「御前及第」士大夫的仕宦發展情況，參考氏著，《宋初朋黨與太平興國三年進士》。

128. 范旻（934-981）是一個很好的說明例子，有關他被遠貶原因及死於任所的情況，見拙作〈「誠兒姪八百字」與范質生平考述：論北宋家訓詩的社會功能及史料價值〉，頁 190-191。

129. 王嗣宗在太宗朝的仕宦發展，見《宋史》卷 287 〈王嗣宗傳〉，頁 9647-9648。

130. 《柳開集》卷 9 〈東郊野夫傳〉，載《全宋文》卷 123，頁 686、688。

柳仲塗開知潤州，胡祕監旦為淮漕，二人者，俱喜以名驚於時。旦造《漢春秋編年》，立五始先經、後經，發明凡例之類，切侔聖作。書甫畢，邀開於金山觀之，頗以述作自矜。開從其招而赴焉，方拂案開編，未暇展閱，拔劍叱之曰：「小子亂常，名教之罪人也。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者，至若丘明而下，公、穀、鄒、邾數子，止取傳述而已，爾何輩，輒敢竊聖經之名冠於編首，今日聊贈一劍，以為後世狂斐之戒！」語訖，勇逐之。旦闊步躡衣，急投舊艦。鋒幾及身，賴舟人擁入，參差不免，猶斫數劍於舷，聊以快憤。（註131）

柳開劍擊胡旦事，祝尙書認為：「此事有無，難以言定，姑錄之以見其人喜名、衛道之狀。」（註132）觀柳開與胡旦皆喜以名相尚，胡旦邀柳開閱其新著，旨在矜誇其發明聖賢奧義之能，柳開拔劍相向，用意亦純為炫耀其衛道的決心，兩者所為，皆出於「喜以名驚於時」的心態所致。換言之，柳開衛道之舉，率以驚世駭俗為目的，所謂是非善惡，悉由胸臆所決：心中所感者是，即是；心中所感者非，即非。以下記載，亦反映柳開好矯飾的性格，所行務在求名，並非遵循儒家禮教：

如京使柳開與處士潘閔為莫逆之交，而尚氣自任，潘常嗤之。端拱中，典全州，道出維揚，潘先世卜居於彼，迎謁江涘，因偕往傳舍，止於廳事。見一堂局鏽甚祕，怒而問吏，吏曰：「凡宿者多不自安，向無人居，已十稔矣。」柳曰：「吾文章可以驚鬼神，膽氣可以警夷夏，何畏哉！」即啟戶掃除，處中而坐。閔潛思曰：「豈有人不畏鬼神乎？」乃託事告歸，請公獨宿。閔出門密謂驛吏曰：「柳公，我之故人，常輕言自銜，今作戲怖渠，無致訝也。」閔薄暮以黛染身，衣豹文犢鼻，吐獸牙，被髮執巨箠，由外垣而入，據廳脊俯視堂廡。是夕，月色倍霽，洞鑒毛髮。柳曳劍循階而行，閔忽變聲呵之，柳悚然舉目。再呵之，似覺惶懼，遽云：「某假道赴任，暫憩此館，非意干忤，幸賜恕之。」閔遂疏柳生平

131. 文瑩，《玉壺清話》（北京：中華書局，1984），29-30。胡旦視《漢春秋》為得意之作，《宋史》稱他曾為此書面世而隆重其事：「斲大硯，方五六尺，刻而瘞之，曰『胡旦修《漢春秋》硯』。」見《宋史》卷432〈胡旦傳〉，頁12830。

132. 《柳開年譜》，頁226。

幽隱不法之事，厲聲曰：「陰府以汝積戾如此，俾吾持符追攝，便須急行。」柳忙然設拜，曰：「事誠有之，其如官序未達，家事未了，倘垂恩庇，誠有厚報。」言訖再拜，繼之以泣，閻徐曰：「汝識吾否？」柳曰：「塵土下士，不識聖者。」閻曰：「只我便是潘閻也。」柳乃連呼閻下。閻素知公性躁暴，是夕潛遁。柳以慙惡，詰朝解舟。（註133）

祝尙書以上文「似小說家言，姑錄以備覽」。（註134）這事是否純出於子虛烏有，已難確考。惟本文不以上述記載全無史料價值，畢竟它生動地道出宋人如何看待柳開的行事作風：「尙氣自任」、「輕言自衒」，以至生平多「積戾」陰事，是柳開在時人心目中的形象。柳開交結品流，雖然不至於匪類，但決非士人心儀的謹厚端士。文中所述的潘閻，本身「亦豪邁之士」，而「所交遊者皆一時豪傑」，柳開是當中的一個。（註135）此輩多不遵循禮法，難免幹些「幽隱不法之事」。柳開以弘揚聖賢道統自任，惟標榜作用大於實際意義；陳義太高，力有不逮之困遂不斷湧現。

綜觀柳開一生行事，言論與實際行事頗有距離，未能貫徹始終之處甚多。例如柳開對於忠孝的評價標準，便出現前後不相符的毛病。開寶四年（971），柳開代「夢壽作」〈宋故和州團練使李侯墓誌銘〉。李侯即李守節（939-971），李筠（？-960）之子；夢壽是臧丙的表字，他嘗為李守節的館客。柳開著作這篇文章時，時年二十五，尙未中進士第。（註136）文章對李守節的政績讚譽不已：

惟王建侯，寧邦國，曰：「咨！爾守節，爾之良，予其耿乃休光；爾之素，乃成績顛隕，其追弗庸克自及。予將其試汝，汝侯于乃單。」單惟政有成，「汝其遷于濟。」濟既五年，始來朝。曰：「西北，晉奸也，汝居遼以扞之。」久弗易厥初民，兵且完。曰：「東南，吳臣也，汝徙和

133. 《湘山野錄·續錄》，頁74-75。

134. 《柳開年譜》，頁235。

135. 《湘山野錄》，卷下，頁54。潘閻的交遊圈子廣闊，所與遊者皆一時才俊。王禹偁稱潘閻為「奇人」，早在「總角之歲，天與詩性，故親族駭其語焉；弱冠之年，世有詩名，故賢英服其才焉。」王禹偁又稱其「趣尙自遠，交遊不群，松無俗姿，鶴有仙格。脫屣場屋，恥原夫之流；棲心雲泉，有終焉之計。言念吳越，跨江而來，錢塘、會稽，賣藥自給，因賦〈浙江觀濤〉之什，為冠絕。」見《王禹偁集》卷18〈潘閻詠潮圖讚〉，載《全宋文》卷154，頁503。錢易（968-1025）與潘閻亦有交情，嘗為潘閻撰寫墓誌：「逍遙與道士馮德之居錢塘，納歸骨于天柱山。大中祥符二年為泗州參軍，卒于官舍。德之遂囊其骨以歸吳中，葬于洞霄宮之右。」見氏著，〈潘閻墓誌〉，載《全宋文》卷210，頁642。

136. 《柳開年譜》，頁217。

以接之。」逮明年，侯死。有仲曰鈞，歸俟于濟。冬，定葬于西。(註137)

但柳開為官後，撰寫〈李守節忠孝論〉時，竟有出爾反爾之言：

我國家有天下之年，將以文綏萬民，不以武靖四方。盜筠結叛謀，陷澤以死，其子守節以謫下待罪，皇帝命捨之，反授單牧，國史載其事。嗚呼！若守節也，胡為生哉？夫君臣以義立，父子以親居。義苟不勝于親，則先其父，而後其君矣；親苟不勝于義，則先其君，而後其父矣。臣子有家國而成身，有忠孝而立行。不幸或不得其兩全，則俯其一，以免污名也。止可亡身以存行，不可亡行以存身。若守節也，于君不見其義，于父不見其親，敗家而傾國，絕忠而滅孝，萬世之罪人也。(註138)

《柳開年譜》以「柳開此論當作於太平興國五年以後，確年不可考」。(註139)而這篇文章成於踏入仕途以後，則是無可置疑的。柳開更在自問自答的形式下，表達個人對李守節行為的憎惡，要誅之而後快：「或曰：『予若立朝廷，將奈守節何？』予曰：『吾若居祿位，立朝廷，雖皇帝以赦之，吾疏請以殺之，用謝其天下之忠臣孝子也。』」(註140)

除了上述事例外，柳開還有其他遭人非議的缺點，如好發大言，任性使氣，有違「君子慎獨」的明訓。沈括（1031-1095）說：「柳開少好任氣，大言凌物，應舉時以文章投主司於簾前，凡千軸，載以獨輪車，引試日，衣襪，自擁車以入，欲以此駭眾取名。時張景能文，有名，唯袖一書，簾前獻之，主司大稱賞，擢景優等。時人為之語曰：『柳開千軸，不如張景一書。』」(註141)在宋人心目中，柳開行止不端、甚至不容於禮教的惡行尚多；其中最為駭人聽聞的，當數啖食人肉人

137.《柳開集》卷11〈宋故和州團練使李侯墓誌銘〉，載《全宋文》卷125，頁718。

138.《柳開集》卷7〈李守節忠孝論〉，載《全宋文》卷121，頁656-657。

139.《柳開年譜》，頁218。

140.《柳開集》卷7〈李守節忠孝論〉，載《全宋文》卷121，頁659。

141. 沈括撰、胡道靜校注，《新校正夢溪筆談》（香港：中華書局，1975），卷9〈人事1〉，頁115。祝尚書對這條史料的可信程度有以下解說：「然據宋祈所作〈故大理評事張公〔景〕墓誌銘〉（《景文集》卷五九），張景生於開寶三年，柳開中進士時年方四歲，所云乖謬，自不待辨。」見《柳開年譜》，頁223。事實上，筆記小說有關柳開行事作風的記載，多屬欠缺根據的傳聞。例如宋人多以柳開嘗強奪錢姓同僚婦女，這事見於《墨客揮犀》及《倦遊雜錄》，亦被江少虞收入《宋朝事實類苑》，反映宋人對柳開行事作風的印象。筆者嘗就此事作過考證，結果是「誇張失實者居多」。見〈誠兒姪八百字〉與范質生平考述，頁188。

肝的惡習，除了前述擊殺惡僕且大嚼其肉外，尚有好食人肝的傳說。《宋朝事實類苑》曰：

柳開，魏郡人，性兇惡，舉進士，至殿中侍御史。後授崇儀使，知全州道，膾人肝，每擒獲溪洞蠻人，必召宴官僚，設鹽豉，遣從卒自背割取肝，抽佩刀割啖之，坐客悚慄。知荊州，常令伺鄰郡，凡有誅殺戮，遣健步求取肝，以充食。（註142）

《鐵圍山叢談》亦云：

江南徐鉉（916-991）歸朝，後坐事出陝右。柳開時為州刺史。開性豪橫，稍不禮鉉。一日，太宗聞開喜生膾人肝，且多不法，謂尚仍五季亂習，怒甚，命鄭文寶（953-1013）將漕陝部，因以治開罪。開得此大懼，知文寶素師事鉉也，遲文寶垂至，始求於鉉焉。（註143）

太祖在位時，軍中猶有食人肉的做法，其事見於乾德元年（963）三月宋軍攻略澧、朗之地。（註144）未審啖食人肉的作用除了威懾敵人之外，是否也源於唐末鹽豉從軍充食的遺風？食人肉的陋習，亦從當日兇暴武人的行事作風反映出來。（註145）太宗一直喜歡扮演有道之君的角色，對殘害人體的野蠻遺風尤為嫉視，為了取締這種陋俗，太宗嘗嚴懲干犯官員。（註146）柳開是否有食人肉人肝的癖好，實難詳考；即

142. 江少虞，《宋朝事實類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卷74〈詐妄謬誤〉，頁986。

143. 蔡條，《鐵圍山叢談》（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卷3，頁46。世傳柳開好食人肝，可從以上記載見其端倪。祝尚書對上引史料的可信性存有懷疑：「按石介早有詩道及柳開食人肝事：『兩人拏人肝，大床橫斗肚。一飲酒一石，賊來不怕懼。』」（〈過魏東郊〉，《徂徠石先生文集》卷二）有其事否不得而知，然柳開求徐鉉說情則斷非事情。按李昉，〈徐公墓誌銘〉（《徐公文集》附錄），徐鉉卒於淳化三年八月，其時柳開尚謫居滁州。」見《柳開年譜》，頁242。

144. 宋太祖乾德元年三月：「張從富等出軍於澧州南，與王師遇，未及交鋒，賊軍望風而潰。李處耘逐北至敖山寨，賊棄寨走，俘獲甚眾。處耘擇所俘體肥者數十人，令左右分食之，少健者悉鯨其面，令先入朗州。會暮，宿寨中。遲明，慕容延釗繼至。所鯨之俘得入城，悉言被擒者為王師所啗食。賊眾大懼，縱火焚州城，驅略居民，奔竄山谷。」見《長編》卷4，頁86-87。

145. 《澠水燕談錄》曰：「國初有王彥升者，本市井販繒人。及壯從軍，累立戰功，至防禦使。性極殘忍，俘獲戎人，則置酒宴飲，引戎人以手捉其耳，對客咀嚼，徐引卮酒。戎人血流被面，彥升笑語自若。前後噉數十百人，亦可怪也。」見《澠水燕談錄》，卷九，頁111。《長編》描述這種舉動的效果曰：「戎人畏懼，不敢犯塞。至天聖中，西戎猶有無耳者，蓋彥昇所啗也。」見卷10，頁236。

146. 有關事例，見於太平興國三年十月：「澧州民有訴為賊所劫奪財而不實者，刺史趙彥韜手殺之，採取其心肝，民家詣闕訴其事。癸酉，彥韜坐杖脊，配隸淮西禁錮。」見《長編》卷19，頁435。

使柳開喜好此道，亦不過是當日不良風氣的縮影而已。無論如何，文臣而沾上喜食人肉人肝的嫌疑，難免招致太宗不快；柳開的仕途發展因此而造成不良影響，亦屬意料中事。

張景為柳開高材而未能盡為世用，感到非常可惜：「其為大賢人也，天下用文治，公是以立制度，施教化，而建三代之治；天下用武治，公足以削暴亂，攘夷狄，而成九伐之勛。惜乎不竟其用也，哀哉！」^(註 147)其言有否過譽，本文不擬細論，所欲詳述者，是柳開在太宗之世屢遭貶斥，實非偶然。太宗除了建立管治制度外，也很著意劃一行為規範守則，以期齊一臣下的行事作風。在整飭風氣大盛的形勢之下，太宗自然容不下標奇立異、自炫駭眾的人物，呼延贊的經歷是一個例子：

驚悍輕率，自言受國恩，誓不與契丹同生，文其體為「赤心殺契丹」字，至於妻子、僕使、同爨皆然。鞍韉器用什物，亦刺繡刻朱墨為之。後復與諸子別敕文曰「出門忘家為國，臨陣忘死為主。」又作降魔杵、破陣刀，鐵折上巾，兩旁有刃，皆重數十斤；乘驢馬，絳抹額。北征時，上惡其詭異惑眾，欲斬之，得免。^(註 148)

夸誕好名，行為詭譎等行事作風，在五代崇尚權謀變詐、不重禮義道德的亂離時代，也許正是建立個人功業的重要條件。但到了宋代，朝廷既致力重建道德價值，改良社會風俗，忽於繩檢且過事標榜的官員，往往招罹嚴懲；呼延贊險被太宗斬殺，實未始無因。然而，呼延贊的身份既是純粹武將，這個例子能否足以展示柳開的際遇與太宗對標奇立異的嫌惡有直接相關，也許有商榷餘地。為了加強拙文論點的說服力，筆者歸納有關史料，詳述太宗一直以建立淳厚風俗為職志，並將一切與此相違的行為舉動視為危害政權的潛在威脅。

無可否認，太宗一直以武人為政權穩定的最大威脅，他們的家族成員也是破

147. 〈行狀〉，頁 319。張景這番說話，亦展示柳開仕宦不顯，乃是令其門人感到遺憾的事。

148. 《長編》卷 33，頁 739。陳峰將呼延贊的際遇，作為勇武將士在宋太宗崇文抑武的政策下，強烈陽剛之氣如何受到消蝕的例子，見氏著，《武士的悲哀》，頁 92-95。

壞社會秩序的負面力量，必須著力整肅其弊。^(註 149) 危害政權的力量除了武將子弟外，文官子弟亦不能忽視，當中尤以無行而好任俠者為然，李飛雄事件突顯這一類人的危險性：「初秦州節度判官李若愚有子曰飛雄，凶險無行，不為其家所容，常客游京師、魏、博間，與無賴惡少年縱酒捕博。以若愚官秦州，盡知其府庫倉廩所有及地形險易、兵籍多少。」^(註 150) 後來李飛雄謀據秦州叛亂，事敗，「有詔夷其三族，并捕先與飛雄善者何大舉等數輩，悉誅之，及姚承遂等皆腰斬於秦州市，先授飛雄馬廐置卒，亦夷其族。」^(註 151)

太宗以嚴酷刑法誅殺李飛雄的族屬及涉案有關人物後，更借勢作為規範臣僚家屬行為的口實，宣示他大舉整飭臣民家中無賴子弟的決心，以期防範於未然：「是月戊申，以飛雄事布告天下，令中外臣庶家子弟或懷凶險，有乖檢率，屢加教戒，曾不悛改，許其尊長聞於州縣，錮送闕下，當配隸遠惡處。容隱不以聞者，葦功以上親坐之。」^(註 152) 太宗遇上環境合適，甚至不惜親自教訓大臣家中行為不檢且帶有武質成份的子弟。宰相薛居正的養子薛惟吉（955-996）「有勇力，不習文，與沈繼宗等俱拜官，獨授諸衛將軍，喜聲色，交遊非類，居正不能止。」太平興國六年六月，薛居正卒：「上臨喪出涕，其妻拜於喪側，上存撫數四，素知惟吉之行，因問：『不肖子安在？頗改節否？恐不能負荷先業，奈何？』惟吉伏喪側，聞之驚懼，愧赧不起。自是盡革故態，謝絕素與交遊者，居喪甚得禮。」^(註 153)

但必須注意的，是太宗灌輸正確意識形態的對象不僅只限於武將或好武而喜任俠之輩，而是擴及至帝國轄境之內的所有士庶臣民。《宋大詔令集》載太宗在太平興國六年十一月癸丑頒下的〈誠飭士庶子弟甥姪等詔〉：

周設鄉飲之禮，以序正長幼；漢立孝悌之選，以敦勸人倫。應內外文武官及兩京、諸道州府士庶子弟甥姪等，方屬承平，宜伸誠諭：自今州縣長吏伺察部內有輕薄無賴，孝悌有虧，貨鬻田園，追隨捕博，宗族所共

149. 整治武人子弟的措施，具見《長編》所載的事例：「初，節度使得補子弟為軍中牙校，因父兄財力，率豪橫奢縱，民間苦之。洛下有十衛內，尤放恣，左驍衛上將軍太原田景咸子漢明，其一也。上雅知其弊，始即位，即詔諸州府籍其名部送闕下，至者凡百人。癸未，悉補殿前承旨，以賤職羈縻之。餘五人，老病不任事，遺還。」（卷 18，頁 401）

150. 《長編》卷 19，頁 429。

151. 《長編》卷 19，頁 430。

152. 《長編》卷 19，頁 431。

153. 《長編》卷 22，頁 432-493。

弃、鄉黨所不容者，并嚴加誘掖，俾之悔改。其間聞義不服、為惡務滋者，即須條具姓名以聞，當置于刑辟。東不率者以告，蓋有格言；致比屋于可封，用成至化。凡爾中外，咸體至懷。(註154)

若細觀這條史文，當可發現太宗所欲建立價值觀念的對象並不只限於官員，庶民也包括在內；官員之中，文臣武將盡皆列入。太宗向所有臣民灌輸以文教作為指導原則的社會行為規範而作的努力，可謂躍然紙上。在這個前提之下，無論統治架構的文武臣僚，或城鎮村墅的貴賤民庶，每當涉及標奇立異或不遵循規範的舉動時，都會招致太宗不快嫌惡，甚至嚴厲打擊。

因此，文臣行事任情率意，不守中道，在太宗心目中亦等同武人無視規章條文，當然不為所喜。《宋史》稱姚坦（935-1009）嘗為皇子趙元傑（972-1003）翊善，其性格「木強固滯」，「王少佚豫，坦即醜詆，王頗鄙其為人。自是坦暴揚其事」。太宗看不過眼，曾為此訓誡姚坦：「元傑知書好學，亦足為賢王矣。少不中節，亦須婉言規諷，況無大故而詆訐之，豈裨贊之道邪？」後來太宗時與姚坦談話時，「坦言及故府，意短諸王而稱己之敢言」。太宗甚感不快，乃在姚坦離去後，向近臣抱怨：「坦在宮邸，不能以正理誨諭，事有微失，即從而揚之，此賣直取名耳。」(註155)所謂「賣直取名」，亦即是自我標榜、激矯求名的具體表現。

太宗銳意處置不顧規範的官員，縱使他們是名臣之後，亦往往不假辭色。《長編》載淳化二年十一月曰：「刑部郎中、知制誥范杲（923-978）數致書宰相，求入翰林為學士，又嘗出制誥一編示李昉，曰：『先公謂杲才可任學士，故以此付杲，不敢失墜。』昉每開釋之。於是獻〈玉堂記〉，請備其職，上惡其躁競，終不使居內署，改右諫議大夫，出知濠州。」(註156)

從以上引述的例子，反映了呼延贊的遭遇實有其廣泛意義：它道出了太宗對於好名自炫、標奇立異諸般違反規範的行為所表達的不快和嫌惡，並沒有文官武將的分別。在這種政治氣候之下，柳開雖然撰文維護綱常名教，亦幹過一些衛道工作，且嘗拯人於水火，但其豪俠作風及種種有損形象的傳聞，不免受到汲汲於

154.《宋大詔令集》（北京：中華書局，1962），卷190，頁696。

155.《宋史》卷277〈姚坦傳〉，頁9418-9419。

156.《長編》卷32，頁725。

整齊風俗的太宗所嫌惡。審查人對於柳開仕宦生涯所展示的歷史意義，提出了饒有啓發性的論說，現引錄其要如下：

簡單說，本文提出了一個有趣的問題，即宋初一方面需要一批兼具「文士『德性』」與「豪俠『才幹』」的官員，另方面又似乎不能容忍他們的「豪俠『作風』」，以致柳開這位豪俠仕途坎坷（假如真的是坎坷的話）。如是，則柳開的失意，恐怕不是他個人的因素，而是朝廷用人的條件本身就有矛盾，沒有看到「文士」與「豪俠」有難以並存的地方。假如柳開的失意真的來自個人的作風，那麼，我們是否可以說，朝廷看來是文士與豪俠並重，但骨子裡畢竟是崇文抑武。

引文一針見血地道出北宋初年用人標準所遇上的困局：文士德性和豪俠才幹，本身就存在著根本矛盾，調和並不容易，這也解釋了柳開仕宦不顯的原因。作者很同意上述論斷：「朝廷看來是文士與豪俠並重，但骨子裡畢竟是崇文抑武。」但同時亦想強調，崇文抑武的例子，並不在於帝王透過新進或近密武人來打擊名位勳業俱高的武人，如王侁之於楊業，史珪、石漢卿之於張瓊，這些例子只能夠說明北宋帝王以武制武的做法；至於真正能夠表達崇文抑武的政策，當要從統治者任用武質文臣時所出現的待遇變化之中瞭解其況。約言之，柳開一生際遇與朝廷用人政策以及時代風氣的轉變，可謂息息相關；其仕宦不顯的原因，亦可在宋廷推行一連串移風易俗措施的政治大氣候之中尋找答案。

審查意見書嘗以「眾多武質文臣的際遇不差，柳開的仕宦不顯似乎屬於少數」，故質疑「單憑柳開的例子，能否說明宋初用人的矛盾？如本文能進一步探討科舉以及北人中舉的比例下降等面向，的確能夠更完整的說明這個問題。」這兩點是很具發揮價值的課題，筆者很樂意在拙文作出解說。

就筆者閱讀有關史料所得到的印象，從數量上言，得到優待的武質文臣確實比較多。出現這個歷史現象，筆者傾向相信大部份武質文臣的作風形象都比柳開正面。若果我們仔細觀察言行不檢而與柳開友好的人物，當可發現他們的仕途每多受到自己的行為所牽累。前文提及的胡旦，是柳開的好友，他曾任職昇州通判：「時江南初平，汰李氏時所度僧，十減六七。旦曰：『彼無田廬可歸，將聚而為盜。』悉黥為兵。」此外，他向太宗上〈平燕議〉，暢論與契丹作戰之道，且著述了《將

帥要略》一書。可見胡旦不僅行事果斷，而且具有武幹材略。但他也犯上行事不循慎獨之旨的毛病，被太宗批評為「恣胸臆狂躁」而遠貶於外。晚年退居襄州時，「尤黷貨，干擾州縣，持吏短長，為時論所薄。」^(註 157)

趙昌言也和柳開友善，太宗嘗授任他為川峽五十二州招安行營馬步軍都部署，然趙昌言的仕途以至在時人心目中的形象卻頗受自己的行事作風所牽累：「昌言強力尚氣概，當官無所顧避，所至以威斷立名，雖經擯斥，未嘗少自抑損。然剛愎縱率，對僚吏慢，時論以此少之。」^(註 158)引文所云「尚氣概」，無疑正是豪俠所尚的任氣使性作風的一種表達方式。

與柳開友善而見於史傳的歷史人物，尚有潘閔：「有詩名，所遊處皆一時豪傑」，他本人也有「豪邁之士」的聲譽。^(註 159)至於他是否與胡旦和趙昌言同屬武質文人，已難考述，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其未能開展仕途與個人不循規範的行徑有直接關係。《長編》載至道元年四月：「丙申，賜布衣潘閔進士及第。未幾，追還詔書，以閔所為狂妄故也。」^(註 160)

以上列舉的柳開好友，多觸及招致太宗不快嫌惡的自炫好名和標奇立異等行徑；這個現象，當可反映「方以類聚，物以群分」的況味。基於這種理解，柳開的例子可以清楚地表達當日的政治大氣候：凡言行無視禮法規範者，無論是文官或武將，仕途受到影響是必然的結果，柳開不算是特例，同時代尚有他人。

至於審查意見書建議從北人中第比例下降來解說拙文的課題，筆者同意這種取向，對於理解北宋中葉以降南北地區士大夫的勢力消長確實非常合宜。但是，柳開以及上述的武質文臣，均在北宋初年中第，隨之開展仕途：柳開，開寶六年進士；王嗣忠，開寶八年（975）進士；張齊賢，太平興國二年（977）進士；張詠，太平興國五年（980）進士。相對而言，南方士大夫當時正受著不同形式的打壓，不具備與北方士大夫在科場政壇頡頏的能力，這種劣勢在真宗之世才得到改善；南人在科場壓倒北人，且在政治上累積了不可輕侮的實力，到仁宗時代才開

157.《宋史》卷 432〈胡旦傳〉，頁 12827-12830。

158.《宋史》卷 267〈趙昌言傳〉，頁 9198。

159.《湘山野錄》卷下，頁 54。

160.《長編》卷 37，頁 812。

始。(註 161)因此，柳開發展仕途之時，南方士人尚未抬頭，他所遇上的競爭對手全部來自北方，故可以稱之為北方官僚彼此之間的圈內競爭；綜觀柳開的仕宦生涯，南人中第與入仕，對他而言從來沒有構成任何障礙。

當然，拙文畢竟只是一件個案研究，與建立完整認知架構以解釋北宋初年的用人標準以至文武關係，距離尚遠，但無論如何，這是一個開始；本文寫作的目的，乃在於拋磚引玉。盼史家不吝珠玉，使拙文的論點得到更進一步的修正補充。

五、結論

《宋史·文苑傳》道出了宋初部分文人的彊幹武質。他們在作風形象上具有豪俠的特質，通文墨之餘，還精通武藝或諳熟兵勢，甚至兩者兼具。這些特點，很能迎合時代的需要。北宋初年，朝廷為了改變自唐末五代以來武人專擅政局的不良風氣而大舉任用文臣，這一點是無庸置疑的。拙文的寫作目的，並不在於強化重覆這個論點，而是道出以往某些學者論證北宋初年所推行的重文政策時，不但所取用例子的論證價值有待商榷，而且過份強調重文與輕武兩者的對立關係，亦即是說，宋廷實行重文政策時，必然要透過輕武來完成，輕武遂被塑造成重文政策得以實現的必須條件。筆者對這些看法不表認同。拙文的其中討論要點，在於擴闊「重文輕武」論點的理解空間，從而闡釋「重文」並不必然導致「輕武」。

由於立國形勢所限，宋初統治者根本欠缺推行重文輕武政策的條件，只能在制衡武臣的事情上多花心思，以防止武人干政的局面重現。假如文治格局的締造前提在於結束武人專擅局面，則在締造過程中，武質文臣參與其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元素。誠然，宋廷有感於加強任用文臣，可收移風易俗之效，但帝王同樣明白北宋開國，正值亂離之世，推行政令的過程中所遇上的武臣抵制以至地方治安維持等問題，非一般文官可以勝任，武質文臣則優為之。在太祖、太宗的心目中，可堪委以重任的文臣，不但要有強力的行政手腕和果斷的處事作風，而且每多帶有武幹性質。

161. 筆者嘗以南唐陪臣為例，闡述入仕北宋的亡國降臣在職任升遷方面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詳見拙作〈北宋選任陪臣的原則：論猜防政策下的南唐陪臣〉，頁 1-31。

對於朝廷而言，任用彊幹武質文臣，遠比儒雅卻流於柔弱的文臣管用；他們管治地方時所發揮的移風易俗等效用，亦絕非只知戎務而昧於文治的武將所能望其項背。在這種理解基礎上言，重文與輕武非但沒有必然對立的關係，相反，宋廷要建立文治局面，便須藉著武質文臣的武幹能力，鎮服武人和維持地方治安。換言之，宋廷推行重文政策時不僅不能輕武，反而要藉武質文臣之力才可更有效地締造文治局面。然而，文臣既有武質成份，便容易在言行方面失卻平衡，而出現自炫好名以至標奇立異等有忽繩檢的行為。這類忽於繩檢的武質文臣觸動了宋廷的大忌，遂淪為打擊對象，本文的主要論述人物柳開，正是這一類武質文臣的典型。

柳開中第以前，一直以繼承和弘揚儒家道統自居，入仕以後，在郡縣管治和邊區戎務的表現，皆顯示其深具文韜武略；儒學訓練和軍事素養，可謂完全配合時代對武質文臣的需求。因此，柳開當有一番顯赫的仕宦生涯，但事實剛剛相反。柳開由應舉到仕途，一直蹇於遭逢，境況艱難，頗有咎由自取的意味。當中最具決定意義的因素，要算他個人的形象和行事作風。在宋人的記載之中，柳開性格兇頑，舉動粗率，頗有行止不端之誚，相較於重操檢、慎言行的君子之風，可謂瞠乎其後，有些傳聞中的表現甚至禮教法度難容，啖食人肉人肝正屬其例。而柳開能夠名列〈文苑傳〉，亦反映宋初文士帶有武質的時代特色，這與後世對文士所應具備的行為作風及形象所作的理解，無疑是存在著相當大的差別。

太宗之世，武將跋扈而破壞政局穩定，已經受到控制，還風俗於淳厚，遂成為優化統治的要素而備受注目。站在帝王用人的層面上言，文士與豪俠結合的確存在困難；忽於繩檢、任情率性或過事標榜的官員，難免受到懲處。在這種政治大氣候之下，柳開雖然不斷宣稱為名教盡力，治績戎略復有可觀，惟其豪俠所常有的輕率言行及種種有損形象的傳聞，不免被致力於改善風俗的太宗所嫌惡，柳開屢遭貶謫降職，亦可謂意料中事。

柳開的際遇，亦反映宋廷雖然看重武質文臣的貢獻，且視之為建立文治局面的重要元素，但當這類臣僚涉及狂妄言行而抵銷朝廷對於改良風俗所作的努力時，統治者即不惜予以嚴厲果斷的打擊。基於這一點認識，拙文強調宋廷制裁武質文臣所作諸種有違規範言行的做法，實際上體現了對於武質文臣效績以及維護移風易俗政策兩者之間所作的取捨平衡，而不應簡單地理解成純粹輕武的結果。

附表：柳開的仕宦生涯及有關重要經歷*

年 份	年歲	職位	影響仕途的重要經歷
開寶八年(975)	29	宋州司寇參軍	釋褐所授之職
開寶九年／太平興國元年(976)	30	宋州錄事參軍	以治獄稱職
太平興國二年(977)	31	宋州錄事參軍	涉嫌盜庫金被拘，當在是年或明年
太平興國三年(978)	32	宋州錄事參軍	
太平興國四年(979)	33	贊善大夫，督運楚、泗八州糧草，復命知常州，遷殿中丞	柳開升遷，反映盜庫金案不得其實而罷。得授常州，乃太宗酬其督運之勞，加上常、潤之地多盜，太宗欲藉其武幹以安靖地方
太平興國五年(980)	34	移知潤州，拜監察御史	在常州治盜有功，朝廷乃將其移到潤州，冀收安靖之效。
太平興國六年(981)	35	知潤州	胡旦著《漢春秋編年》狂斐聖教，柳開乃拔劍追斫，盡展其喜名、衛道之狀
太平興國七年(982)	36	知潤州	丁母憂，有詔復起
太平興國八年(983)	37	知潤州	潘閔贈詩。重修潤州孔廟成，親撰碑文
太平興國九年／雍熙元年(984)	38	由潤州詔歸，改知貝州	白執政以家在河北，先人喪葬未辦，弟妹婚嫁失時，乃得授貝州
雍熙二年(985)	39	上蔡令	坐與兵馬都監紛爭，故有是貶。在上蔡以興利愛民為務

雍熙三年(986)	40	上蔡令、復殿中侍御史，出使河北	任上蔡令時，率縣民軍糧至京師，上書執政以求牽復，在軍上識破契丹詐降以緩宋師攻勢之謀，並在過關時獻書，乞從邊軍效死，復得為殿中侍御史
雍熙四年(987)	41	改崇儀使，知寧邊軍	赴任時，潘閬以詩相送
端拱元年(988)	42	知寧邊軍，詔替歸京，出知全州	在寧邊軍策反白萬德，為趙昌言所累，被出為全州，道出維揚，潘閬戲裝鬼怪以怖之
端拱二年(989)	43	知全州	招撫溪洞粟氏，作〈時鑒〉
淳化元年(990)	44	移知桂州	與趙昌言書，以求薦用
淳化二年(991)	45		是年春，詔回京師，冬，以全州黥徒事下獄四個月，勒停並追奪官職
淳化三年(992)	46	責授復州團練副使，後移滁州	
淳化四年(993)	47	自滁州詔還，復為崇儀使	年初，以大赦上表太宗求牽復，遂有是恩
		出知環州	平蕃漢市易斗秤，甚得蕃情
淳化五年(994)	48	移知邠州，冬，詔歸	移書轉運使，罷州民輦饋，惟傳說其喜生膾人肝，為太宗所嫌惡
至道元年(995)	49	出知曹州	戢止曹人興訟辭鬪之風
		移邢州	上書求近魏官謀葬
至道二年(996)	50	知邢州	求假歸魏葬喪
至道三年(997)	51	知邢州，加如京使	真宗即位
咸平元年(998)	52	改知代州	在代州日，上書言邊事

咸平二年(999)	53	移知忻州	知代州時，力奏修葺壞城，觸諸將忌恨，自請改任，契丹入寇時，上書請真宗駕幸河北
咸平三年(1000)	54	移知滄州	卒於并州

* 附表所載內容，始自柳開中第入仕，資料主要來自祝尙書編撰的《柳開年譜》。由於史料闕略，已不可能具體說明那一件事直接導致柳開的職位升降；目前可以做的，是臚列柳開所歷的職任和他在任內的重要事蹟，以便對柳開的仕宦生涯作一整體觀察。

Men of Letters and Unrestrained Swordsmen in the Early Northern Song: The Style and Image of Liu Kai

Pak-sheung NG

Chinese Civilization Centr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BSTRACT

This study, based on a careful reading and interpretation of literary and historical texts, challenges the widely accepted notion that Song literati became effeminate as a result of the military culture being de-emphasized. To substantiate this argument, this paper analyzes how the double role of literati and knight-errantry was played by Liu Kai in the early Northern Song. Liu Kai's double role is a good example to indicate a trend that men of letters in North China generally acquainted themselves with martial arts. Examining the implication of the policy of upholding the literary and restraining the military is another focus of attention. In the process of establishing a civil administration, the Northern Song had to deal with a number of difficulties caused by recalcitrant military officials and banditry; only martial literati instead of frail scholars were able to handle the situations effectively. In this sense, the civil officials who were assigned with the tasks of holding the military in check and suppressing bandits needed to be militarily as well as literarily capable. Lastly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ain how Liu Kai's career was affected by the measures that were implement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ith a view to transforming the negative social and political traditions prevailing over the Five Dynasties era; this is of particular importance for us to underst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appointment principle adopted by the early Northern Song. Although the Northern Song viewed martial literati as a necessary mean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civil administration, the government did not hesitate to impose severe punishments on those who acted in utter disregard of the law and discipline and

consequently neutralized the imperial efforts to achieve social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s.

Key words: men of letters, civil officials, unrestrained swordsmen, martial literati, “uphold the literary and restrain the military”

(收稿日期：2006.2.23；修正稿日期：2006.8.16；通過刊登日期：2006.11.8)